

历史
史
遗
痕



历史遗痕

利玛窦及明清西方传教士墓地

策划 高智瑜

编者 林 华 余三乐 钟志勇 高智瑜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6 号

历史遗痕

利玛窦及明清西方传教士墓地

策划 高智瑜

编者 林 华 余三乐

钟志勇 高智瑜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发行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编 100872)

印刷者：北京丰华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6 开

字 数：240 000

印 张：10 插页 9

版 次：199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册 数：1—2 300

书 号：ISBN7-300-01941-2/K·194

定 价：14.80 元

139038

历史 遗痕



利玛窦像



南怀仁像



汤若望像



山字楼·圣母会修道院



山字楼教堂



山字楼东侧



口字楼—文声学院



文声学院



原神父宿舍



原墓地石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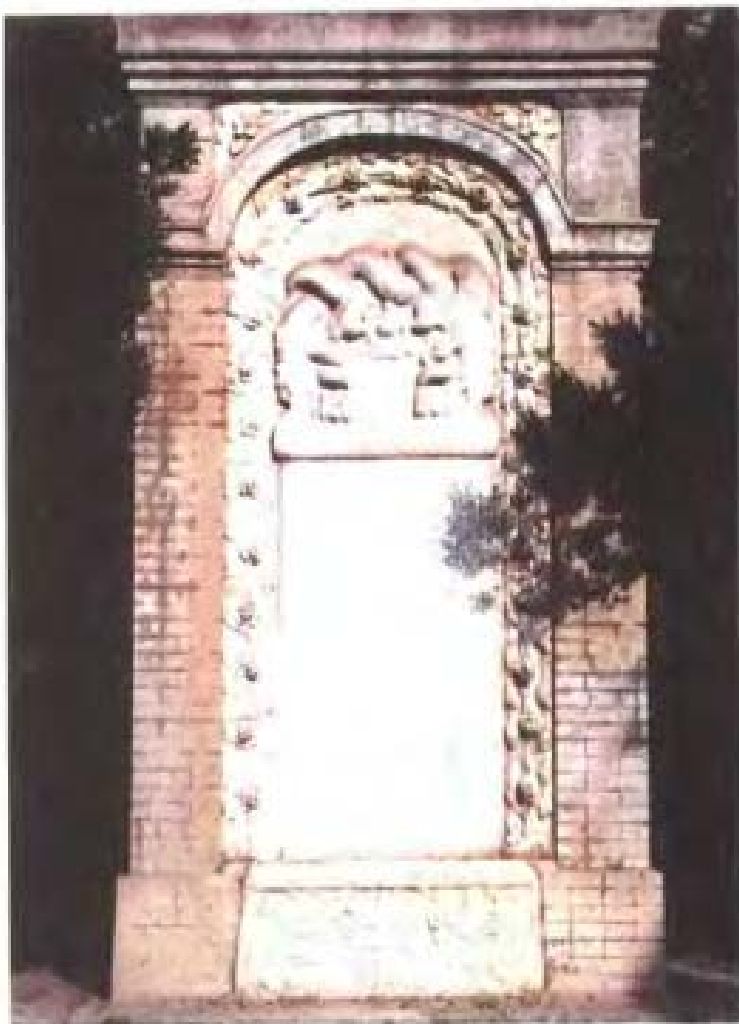
石门前残碑



利玛窦、汤若望、
南怀仁墓地及墓穴



历史 遗痕



利玛窦墓碑



汤若望墓碑



南怀仁墓碑



明清传教士
墓地



墓地一角



墓地一角



碑首



碑首



碑座



碑座

葡萄牙总理
拜谒碑林



历史遗痕



法、奥、捷、荷、瑞典
大使参观墓地



德、智、阿根廷、
委内瑞拉、厄瓜多耳
大使参观墓地



意大利天民党主席、
意大使拜谒墓地

目 录

一段不应忘却的历史.....	1
几度沧桑话“栅栏”.....	7
栅栏墓地碑文录.....	21
栅栏墓地碑文资料录.....	121
来华西方传教士研究文献检索.....	151
后记.....	157

一段不应忘却的历史

北京西城西北隅一座幽静校园内，浓荫蔽日。在苍松翠柏和黄杨柔枝交相掩映下，银灰色低矮花墙护围着一大一小两块经过另行修整的墓园比肩立于校园中央。小园内，倒品字形端立着三块墓碑，著名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墓碑居中，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和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的墓碑伫立于左右两侧。大园中重新树起的墓碑林林总总，厚重深沉。栅栏墓地早期南大门（俗称石门）也已搬迁至小园正前方，从而形成校园内独立的墓地格局。这就是闻名于世的滕公栅栏墓地。

自1610年意大利籍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第一个入葬于明万历皇帝钦赐给他的这块墓地起，相继有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著名传教士、科学家、画家随之而静卧于这方土地，墓地面积也不断扩大。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栅栏墓地已先后埋葬了约数百位西方传教士，成为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东方安息的一个最为集中的地方。

栅栏墓地距今已有383年的历史。三个多世纪，在西欧进入资本主义之后接踵诞生的栅栏墓地，经历了几多风雨。这一时期，西方各殖民主义国家都曾利用天主教作为对外掠夺的工具。在中国，天主教为侵略目的服务的作用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的一百年间，耶稣会作为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曾给中国造成过许多重大灾难。这是人们所不应忘却的。在此以前，受遣来华的传教士，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确实负有为殖民主义掠夺、扩张做意识形态方面准备的责任。但是，以讲习西洋科学为手段、以宣传天主教为目的的一批传教士们，却又在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过自己的贡献。这同样是人们不该忘怀的。

生存于世界这个泱泱系统中的不同民族和国家，在各自所处的客观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经过世世代代的实践、求索，不懈的努力，创造出有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以及由原始图腾崇拜幻化而来的各具特色的宗教。宗教从来都是世界上一切民族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无法拒绝的一种理性的扭曲反映。当它一旦与统治阶级相结合，就会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并给予人类社会诸多方面以深刻影响：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观念的；等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把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看作是一种社会制度，一种文化思想体系。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世界上逐渐形成迄今为止人们所认同的四个文化圈，即儒教文化圈、佛教印度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和基督教文化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四个文化圈相互渗透，联系日趋紧密。例如，在儒教文化圈地域内，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文化现象皆有所见，构成

以儒教为主体，多种宗教并存的局面，其间，彼此虽有矛盾冲突，但并存局面从未消弥。其余三个文化圈的情况也大抵相类似。应该说，这种渗透与联系，是与世界范围内经济联系的增长和国际交往的加强相一致的。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文化的交融，文化交融又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文化交融与社会进步是共生共存的。

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时，外来文化包括宗教的传入，不是与这个国家的先进文化相融合，就是被打上先进文化的深深烙印。由于经济、政治、社会思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种领先地位又不是一层不变的。人类社会就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先进更迭中向前迈进，从而带动着人类文明日益走向成熟。这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所昭示的历程，是一种广义上的文化交流，它向人们揭示了世界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正因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求得到振兴、发展，就一天也离不开对他民族、他国家或地区敞开自己的大门。开门，就意味着交流。而在这种广义的文化交流中，宗教应该说是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的。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情况。中国对世界的接纳并走向世界，其源甚长，而经济与宗教，又常常是这种接纳和走向的重要手段。在中国，规模宏大者，一般认为有印度佛教文化的输入和西方文化输入两次。

两千多年前，秦统一中国后，徐福方士率领三千童男童女的浩荡队伍，抱着为始皇帝寻求长生术的企盼，东渡大海，一去杳无音讯，不明所终，无法知晓其在始初的华夏文化输出事业中有哪些确切贡献，但这毕竟是最早大规模迈出国门的一次尝试。两汉时期，张骞、班超先后出使西域，其遣使的足迹就曾远达中亚、罗马帝国及波斯湾一带，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做出了贡献，促进了中国与中亚经济文化的交流。两汉之际，佛教也在这种交流中，经由西域传入中国内地。其后，不少印度和西域僧侣纷至汉地，以洛阳为中心，进行佛教的宣传及经典翻译活动。佛教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传播，到唐代达于最盛。东晋僧人法显，唐代高僧玄奘及净义，就是古代中国西向研习佛教最有影响的代表。所得梵本佛经及个人著述，都同时是研究中亚、南亚诸国历史文化、风俗民情的宝贵资料。在长期颂佛传经过程中，产生于印度的佛教经过佛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结合，已在很大程度上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宗教，佛教的诸多宗派在唐代形成，中国也在事实上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几乎与唐代佛教鼎盛的同时，先后经“丝路”（陆路）与“瓷路”（海路）传入的伊斯兰教，折射出中西交通的大开与中阿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成为影响最大的外来宗教。几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随着古代中国先进农业、手工业技术的西传，中国文化包括儒教文化也源源传向中亚、西亚和南亚地区，并日渐产生实际的影响。可以说，汉唐以来印度佛教文化的输入，儒教文化的输出，表明宗教文化在推动中外的相互了解，以及影响古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起过不小的作用。这就是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外文化交流。

以认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大规模中外文化交流，开始于封建大一统中国走向衰落的艰难时期。站在介绍西方文化前列的，无疑是一批来华的西方传教士。

明以前，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两起两落。早在唐贞观初年，基督教的一个分支景教就曾由叙利亚经波斯传入中国，并在长安建寺，向全国各地传播，信仰者甚众。后在武宗会昌灭佛中同时被禁，从此在中国基本绝迹。至元代，由于最高统治者对宗教取兼容政策，基督教也同道教、佛教一样得到较大发展。在中国的第一任天主教总主教，就是 13

世纪末由罗马教皇派来大都（今北京）的。当年大都城内曾设教堂两所，受洗礼者数千人。元顺帝因受传教士的馈赠，曾通过他们致函教皇。从此，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就大规模开展起来，元末时信徒已达3万。这对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起了一定作用。元灭，基督教在中国也随之一度泯灭。

随着1498年东方新航线的发现，大批欧洲殖民者、商人等又相继东来从事侵略或贸易活动。最先涉足中国的葡萄牙于1535年开始占取澳门，天主教耶稣会士也纷纷被委派，由此进入中国内地，甚至远达北京跻身于最高统治集团。其主要代表当首推利玛窦、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等。

利玛窦，意大利人。1582年来华，先抵澳门，后在肇庆、苏州、南京、南昌等地活动，并随时准备进京。1598年曾在一王姓尚书帮助下到过北京，不久即因故离去。1601年1月经天津再次入京，直到1610年4月去世。在华28年。邓玉函，瑞士人，1620年抵澳门，后奉命前往浙江嘉定学习中国文字，曾去杭州避难。经徐光启推荐到北京朝廷负责制定历法。1630年去世，在华9年。汤若望，德意志人，晚利氏40年来华，曾在京学中国语言及习俗，不久去陕西。1630年再入京，接替邓玉函完成历书编纂事业。明亡归清。康熙初年被劾入狱，获释后继续从事传教及天文研究著述活动。1666年歿于北京，在华44年。南怀仁，比利时人，晚汤37年来华，先在陕西协助汤从事传教活动，次年至京，后与汤同时入狱，获释后幽居北京，康熙七年被起用，1688年去世，在华29年。四人均入葬栅栏墓地。

在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潮涌动中，由罗马教廷任命为东方大教区的副主教范礼安，首先提出采用适合中国国情的传教方式，以求得发展，并要求传教士们潜心学习中国语言习俗。后于他来到澳门的罗明坚、利玛窦也认为，最有效的布道方式莫过于精通中国语言以及风俗、观念。这些认识，在事实上推动了通过传教活动促进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融。利玛窦则堪称开此先河并取得卓越成就的第一人。有人称赞他是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最高范例”，贡献“是永垂不朽的”（李约瑟语）。

毫无疑问，与一切传教士的目的——一样，利玛窦来华，为的是在潜移默化中争取中国朝野上下、官吏平民有更多的人接受并信仰天主教。在达到这一目的所采取的手段上，他则高出于其先行者和后来人。他深知，要在一个封闭的东方封建大帝国宣传与其传统文化完全相左的宗教教义，不深入于这个大帝国的社会内部，不了解、不谙熟它的礼仪风俗民情，是绝然不会有收获的。正因此，他对经过传教拥有多少信徒并不十分关心，他更重视的是通过西学和科学技术的介绍，加强对中国上层社会的影响，以引起中国人对天主教的关注。28年的在华生涯，他正是将尊重中国文化、介绍近代西方自然科学与宣传教义很好地结合起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关于第一种结合，即尊重中国文化与宣传天主教义的结合，利玛窦以及不少传教士都认为，只有熟悉并尊重中国文化，才能得到中国百姓的尊敬，从而在中国站稳脚跟；而要真正获得在中国稳固的传教权，争取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正因此，他们就十分重视与身居高位的中国士大夫和社会名流的广泛接触，以期由此打开通向朝廷的路。

基于上述认识，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从学习中国语言开始了在华的传教生活。不少人一到澳门，就专心致志于中国语言的学习。利玛窦更是将精通中国经史，熟悉中国文化甚至讲习北京官话作为自己的目标。当然，能够推动传教士们潜心习汉的

重要原因，还在于灿烂的中华文明确实深深地吸引着这群对古老中国知之甚少的西方人。于是，这些高鼻蓝眼的异乡客，以仰慕中国文化和政治而诚心朝拜为由来到中国，逐渐被中华文化所濡染，他们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住进中式房屋，口操流利官话或方言，过着中国式生活，并熟练运用古典书籍，引经据典进行传教。这些努力，很快在感观上大大缩小了西洋人与中国人之间的距离。为迎合中国人含蓄、内向，讲究秩序的心态，他们特意变欧洲式街头大众传教方式为有问有应，促膝谈心（与官吏的交往尤其如此），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对于神学宣传，他们也尽量在翻译上选用较易为中国人所接受并有亲切感的用语，例如将“上帝”称作“天主”，即“天上的主人”，这就得到了“敬天法祖”的中国人的认同。对于主要表现为中国人尊孔祭祖活动的“法祖”，教会应持何种态度呢，熟悉中国文化的利玛窦认为，这不是一种宗教迷信，而是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具有特殊意义的民俗，天主教不应加以禁止，而应允许并尊重中国教徒参与这种传统活动的权利。尽管这一处置在以后引起了一场教会内部的礼仪之争，但历史证明利玛窦的主张是正确的。不知当年利氏是否懂得“入乡随俗”这句为中国人所信奉的话，但他在行动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是令人钦佩的。

值得一提的是，早期来华的许多传教士，都十分重视研究儒家思想，熟悉中国伦理、制度，他们常以汉文著述的方式，向中国人解释和宣传天主教义，历史上统称此类书籍为“汉译西学书”。罗明坚所著《天主圣教实录》，为此类书之最早者，最著名的当数利玛窦的《天主实义》。曾与利玛窦“三度相会”的李贽就赞扬他是“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行此间之礼仪”，“中极玲珑，外极朴实”的“极极致人也”。足见其中学造诣之深。

在第二种结合即促进介绍近代西方自然科学与宣传天主教义相结合的过程中，利玛窦等传教士利用广泛接触朝野著名人士的机会，巧妙地利用西方科学知识博取他们的信任，从而扣开了进入统治集团内部的大门。传教士们与中国士大夫频繁交往，万历年间的进士不少人就与利氏关系密切，其中尤以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叶向高等人为甚。他们常聚游一处，或以儒家经典相切磋，或以西方天文、数学及地理知识等相沟通，言道言理，上穷九天，旁该万事，所学皆有长进。与利氏过从甚密的徐光启，1605年就受洗礼入教，曾为利之著作撰《山海与地图经解》，解释天地为圆体之说。自1606年秋开始，由利口传，徐光启笔受，以半年时间，三易其稿，译成《几何原本》前六卷，付刻前，又撰《刻几何原本序》，称利先生从少年时，论道之暇，留意艺学，所译六卷，皆“由显入微，从疑得信”，“真可谓万象之形图，百家之学海”。在另一篇《几何原本杂议》中，徐光启认为，读此书，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更得出了“几何之学，缜密甚矣”，当世“习者盖寡”，“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的结论，其思维的睿智和预测的准确，由此可见一斑。另一著名学者李之藻也常求教于利玛窦，在撰写《浑盖通宪图论》过程中，每每请其审定。其后，经利口授“测圆”、“割圆”、“穷研天体”、“表里算术，推演几何”等内容，由李之藻演撰成“环容较义”。而利玛窦也在与众多士大夫的接触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在其去世前两年，就曾撰写了问答式著作《畸人十篇》，以儒家学说讲述天主教理，问答所涉及的著名士大夫就有徐光启、李载、吴达可、龚三益等人。李之藻、周炳谟等为其作序。此一著述，实际上是中西合璧的产物。

通过传教士，使中国开始了解近代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通过传教士，又使西方进一步认识了古老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这种直接而又便捷的双向学习，对推动第二次中西文

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耶稣会士徐日升当年在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传教士对俄国来说，他们是当汉学几乎还不存在的时候最早的东方专家和汉学家；对中国来说，他们是当中国人对西方几乎一无所知的时候最初的西方专家。借用这个评价来审视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传教士，也许是颇为贴切的。

传教士们与中国士大夫阶层深入交往的直接成果，就是一步步接近了中国最高统治者。他们知道，士大夫们对西方科学技术和学识远比对宗教更感兴趣，因而极力以此赢得朝廷的信任和支持，并获得在京城传教的权利，不少人甚至担任了朝廷命官。当年在两广总督帮助下进入肇庆的利玛窦，1598年曾经由位在尚书的王姓官员协助到过北京。1601年1月再次正式入京后，即向万历皇帝进献方物，那些新奇的自鸣钟和其他器物，颇得皇帝欢心，遂被邀留于宫内。

利玛窦了解到皇室对制定历法有浓厚兴趣，即专请耶稣会本部派来懂得天文知识的人员，为皇室制定新历法。传教士庞迪我、熊三拔、邓玉函、龙华民、汤若望、罗雅谷、南怀仁等就曾先后参加过明清两朝制定历法的工作。与邓玉函共同参与此事的中国官员，有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崇祯二年，改宣武门内首善书院为历局，成为专门从事修历工作的机构。邓去世后，汤奉召入京，继续完成此项事业，同任此事的有罗雅谷、南怀仁。至1634年，经5次编修的137卷《崇祯历书》终于完成。明亡后，汤继续为清修历，1645年任清钦天监监正，1646年因编《大清时宪历》有功，升任太常侍卿。在清代，南怀仁曾因制造天文器材有功，被授予太常侍卿，康熙十七年又因修历有功而被授予通政使官职。汤、南二人还分别奉命为明清两朝制造过大炮，深得统治者的赏识。在紫禁城内供职的一些传教士，与中国官员一道测定过日蚀，测量北京所处纬度，为进一步以科学态度认识自然现象做出了努力。

除制定历法，传教士们还多有著述。这些汉译西学书多为宣讲教义之作，其中也不乏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熊三拔的《泰西水法》，就集中传授了西方农业生产知识，在京共分6册发行。傅汛际将亚里士多德的《天地论》译成汉文，另有一本《名理探》，则是将西方哲学和伦理学知识直接翻译而成的。

在为朝廷服务期间，这些传教士们并未忘记自己身负的传教职责。当他们因宣传西方科学知识和奉献先进器物而博得朝廷上下的赞赏后，就开始了在紫禁城内的传教活动。仅汤若望一人，就为明朝紫禁城内的后妃、高官和皇室随从等约200人授了洗礼。供职于清廷后，汤更被顺治帝尊为“玛法”，信教者日众。1650年，汤在北京建立天主堂南堂，顺治钦赐“钦崇天道”匾额以示恩宠。次年，更授予“通义大夫”称号。仅1650年至1664年的15年间，信教人数就达到10万人。可以说，具有浓郁西方特色的宗教，在东方部分地发挥了作用。西方传教士在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成果，尽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仅仅限于宫闱之内和士大夫群中，并未走出红墙，走向社会，但是，它的影响及缓慢产生的裂变，却超过了他们在传教方面的记录。这也许是罗马教廷所始料不及的。

从历史的回顾中，我们得到了历史的启示。由明末开始的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大潮，如果按照已经开辟的道路顺利地走下去，可以预料，东西方之间在科学领域内的差距将会逐步缩小。这是因为，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并不是只有四大发明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天文、数学、力学、历算等方面，我们也并不都落后。东汉郑玄就早于英国学者胡克1500年发现了弹性定律；祖冲之计算圆周率的准确，亦为世人所称道。这说明，文化积淀

深厚的中华民族，只要有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在中西方的交往中，是能够有效地掌握西方近代先进科学知识以补己之不足的。然而，历史容不得假设。与短暂出现于明末清初对外兼容并蓄局面并存的，还有一股排斥以至反对西学西教的势力，几次教案的兴起就是证明。这一时期，罗马教廷因在华传教士内部的礼仪之争而最终作出了禁止中国教徒参加尊孔祭祖仪式的决定，明显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结果导致康熙明谕禁教，直至雍正、乾隆，均不曾有所改变。清政府的文化专制统治愈演愈烈，封建大一统帝国更趋保守，闭关锁国达于顶点。事实上，越是关起门来以老来自居，越是将先进文化拒之门外，离世界发展新潮流就越来越远。一旦野心勃勃的西方列强用炮舰轰开了古老帝国的大门，皇帝贵胄们就迅速从盲目自尊的宝座上跌落下来，嬗变为怯懦无能的卖国求荣者。西方传教士们这时也跟在炮舰后面，几乎完全充当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再也不主要是西学东渐和中学西进的媒介了。中国人民的仇教情绪在增长。经过19世纪6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将近三十年的反教会斗争此伏彼起，成为反侵略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最终导致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曾经推动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的西方传教士，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其后来者中的多数也就一变而在为侵略扩张推波助澜了。这是历史应该做出的公正结论。

如今，那些在中西文化交流事业中尽过自己心力的西方传教士们，长眠在栅栏墓地已经近四百年了。他们的身躯，早已化作一抔黄土，融入于中华大地，只留下了超越时空的推进人类文明的精神；耸立在这精神之上的一通通厚重墓碑，则记录了在科学文化面前中西方曾经共同做出过的努力，而墓碑本身，也就成了实实在在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正因此，近十年来，一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及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前来参观拜谒。其他各方参观者，已达数千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关注。

中国的一位伟人说过，凡是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过贡献的人，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出版这本小书，目的也在于此。

几度沧桑话“栅栏”

距今三百八十多年前，明王朝都城城西、阜成门外偏北一公里处，有一个被称作“滕公栅栏”的地方。当时，这里有房舍二十八间，是一位杨姓太监的别墅。杨太监获罪下狱后，他为了保住这份产业，暗暗地让人将此处改建成一座寺庙，名“仁恩寺”。庙里供奉着“冥府之神”——地藏王。

在古都北京的城郊，像这样的寺庙数以百计，然而“滕公栅栏”却成了一处闻名世界的所在。这是因为它与一位意大利传教士的名字连在了一起，他就是“Matteo Ricci”，中国名字叫“利玛窦”。

(一)

公元1552年，利玛窦生于意大利的马塞莱塔城（Macerata），十六岁入天主教耶稣会，进圣安德修道院研习神学，且精通西洋文理知识。1582年，他辗转数国来到澳门，学习汉语，继而到肇庆、韶州、临江、南京等处传教。利玛窦尊重中国文化、习俗，穿华服，说华语，钻研儒家经典，将天主教义与传统儒学结合起来，以“去佛补儒”的方式传授天主教义；同时，他积极向中国学者、官员介绍西洋科学知识，因此博得了当时中国上层社会人士的好感，广交了朋友。1601年，也就是万历二十九年，利玛窦在不少官员的帮助下，得以入京朝觐神宗皇帝，向中国皇帝敬献了天主圣像、天主经典、圣母像、自鸣钟和万国地图等礼物，获得了在京居住的权利。他与徐光启、李之藻合作，分别翻译了《几何原本》、《同文算指》等重要科学著作。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在北京病逝，终年五十八岁。

意大利远离中国数万里，回故乡安葬已无可能。按当时惯例，客死中国的传教士均葬于澳门。与利玛窦共事的外国神父与中国教友们，更愿意遵从死者生前遗愿，将其就近葬在北京，并想以此证明天主教在中国的合法性。

他们经过协商，决定以西班牙籍耶稣会士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出面，向神宗皇帝写一份经李之藻（时人所称“天主教在华三大支柱”之一）润饰的奏章（这一奏章被载人另一位“支柱”杨廷筠〔第三人为徐光启〕的《海徼同文记》一书中）。

为取悦皇帝，庞迪我在奏章中恳切陈词，称他们出于对天朝德化的仰慕，“经海上八万余里，跋涉三载，艰苦备尝”，终能朝见皇上，贡献方物，并对能得到皇上“给赐廩饩”，“照例

安插”，表示“感激不胜”，“损躯莫报”。

奏疏继而写道：“不意，于万历三十八年闰三月十九日，利玛窦以年老患病身故。异域孤臣，情实可怜，道途险远，海人多所忌讳，必不能将柩返国。”虽系远夷，但“生既蒙豢养于升斗”，“死犹望掩覆于泉壤”。

庞迪我言：“况臣利玛窦自入圣朝，渐习熙明之化，读书通理，朝夕虔恭，焚香祝天，颂圣一念，犬马报恩，忠赤之心，都城士民共知，非敢饰说。生前颇称好学，颇能著述。先在海邦，原系知名之士；及来上国，亦为缙绅所嘉。”这样一个臣民，死无葬地，实在是可悲的。

因此他“泣血祈恳天恩，查赐闲地亩余，或废寺闲屋数间。俾异域遗骸得以埋瘞，而臣等见在四人，亦得生死相依，恪守教规”，“既享天朝乐土太平之福，亦毕蝼蚁外臣报效之诚”。（《利玛窦中国札记》下第 620 页）

陈情奏章既呈，庞迪我又将一副本交与内阁大学士叶向高，请其从中疏通。叶向高在南京时即与利玛窦过从甚密，到北京后也有交往，曾两次宴请利神父。他表示，尽管外国人在京郊求得一块墓地是没有先例和法律依据的，但是对于利玛窦来说，则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因而愿意促成此事。

明神宗素来懒得出奇，此次办事却相当迅速。他及时将庞迪我的奏疏批与叶向高，令其妥善处理。教士们猜测，若非“全能全知的天主”产生的影响，就是一直摆在皇帝视线之内的“利神父进贡的自鸣钟”发生了效力。亦或像太监们曾向利神父透露的那样，皇上对能将一束白光魔术般地分为七色的这些外国人，说不定也能将土石变成黄金寄予厚望，因而对神父格外开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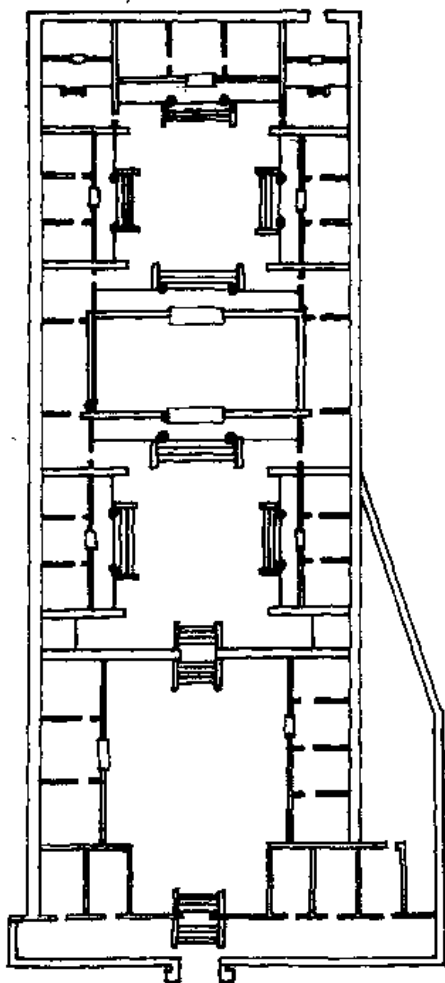
叶向高以积极的态度，将公文交与分管这类事务的礼部。与此同时，李之藻专程拜访了自己的老师、礼部尚书吴道南。李之藻详细地介绍了利神父的为人。吴道南当即慨然应允，愿尽其所能，玉成此事。

一个月以后，礼部向皇帝提出了处理办法。他们在《大明会典》中找到了有利的根据：凡外国使臣来大明京城朝贡者，如死在途中某个省分，即在该省分安排一块墓地。如死者已晋谒了朝廷，而尚未领赏，即由京城的地方官——顺天府尹担负其丧葬费用；如已领赏，就从赏金中支付。

礼部的呈文进一步说，利玛窦虽不是外国使臣，但因仰慕中国文化和大明德政而自泰西来，死前数年已领朝廷俸禄。且好学不倦，颇有成就。因此庞迪我的要求应予答应。礼部恳请皇上责成顺天府尹，寻找一座空庙及一块土地，为利玛窦建造墓地，并供庞迪我等居住，依其习俗，崇拜天主，也为皇上祈祷。（注：《明神宗实录》万历三十年六月十四日载：“抄得会典，如系陪臣未到京者，所在布政司置地茔葬，立石封识。又一款，夷使在馆未经领赏病故者，行顺天府转行宛大二县与棺木银，领赏之后，听其自行埋葬。今玛窦虽未经该国差遣，而向化远来，久经豢养之恩……如玛窦者，跋涉远途，入京朝贡，在馆廩饩十载于兹。而玛窦渐染中华之教，勤学明理，著述可称。一旦溘然物故，万里孤魂不堪归柩，情殊可闵。维据庞迪我请给地各节，虽其来自中土，与外维遣陪臣不同。但久依辇毂，即属吾人。生既使之糊口于大官，死岂宜令其暴骨于浅土？且庞迪我等四人愿以生死相依，亦当并议优恤，相应依从。伏乞敕下本部转行顺天府，查有空闲寺观庙宇隙地亩余，给与已故利玛窦为埋葬之所。见在庞迪我等许就近居住，恪守教规，视天颂圣。”）

明神宗又以出奇的快速度，于次日将呈文转与阁臣们，以叶向高为首的内阁大学士们阅后，签一“可”字，即表明获得了明王朝最高统治者的通过。其间杨太监的同僚们曾出面阻止，甚至还告到笃信佛教的太后那里。也有官员以“从无此例”来诘问。叶向高予以反驳：自古来华洋人，“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毋论其它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艾儒略《西泰利先生行迹》，载张星琅《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382页）

呈文终于批给顺天府尹黄吉士办理。黄吉士向庞迪我提供了四个可选择的地点。庞迪我最后选择了在本文开头谈及的，被称为“滕公栅栏”的地方，作为利神父墓地。神父曾问及墓地的价格，中国官员告诉他，这是没收获罪太监的财产，由皇上赐与，因此是免费的，而且是永远免税的。黄吉士还为利玛窦神父送了一方书有“慕义立言”四字匾额，上款为“泰西利玛窦”，下款为“少京兆黄吉士立”。



仁恩寺平面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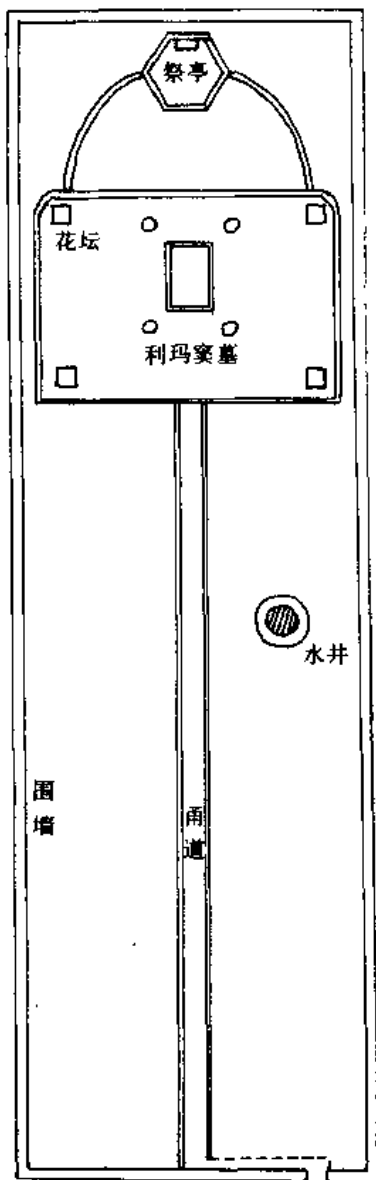
这幢改为庙宇的别墅是在三十年前花费四万金建造的，共有四进院落，红砖木柱，非常结实。它远离闹市，环境安适静谧，是个读书休息的好住处。神父们对此做了颇为动情的推测，“替我们费心寻找此地的官员的目的，就是能使神父们拥有一处离开市区喧嚣的地方，可以安心的将西洋书翻译成中文。这也是很多人所期望的”。（《利玛窦中国传教史》第572页）

“滕公栅栏”归属耶稣会之后，礼部尚书吴道南和顺天府尹黄吉士还分别在别墅大门上张贴告示。告示大意说，皇恩浩荡，泽被遐迩，施及外籍神父，已若干年。现钦赐利玛窦，一如本国子民，一块葬身之地，并利氏之同伴永久居留之所。在此彼等可实习其宗教信仰。告示还申明：没有神父的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入该地骚扰，否则将受到惩罚。

接着，教士们彻底改造了原有庙宇。地藏菩萨被搬倒。墙上反映地狱各种酷刑从而劝人今世行善的彩绘被涂盖。取而代之的是天主教的祭台和耶稣救世主的画像。一座小小的圣堂就算建成了。1611年4月22日，利玛窦神父的白色棺槨由二十四人抬着迁往新墓地。众多教徒在带有耶稣受难的十字架的引导下，随后面行。棺槨暂厝在圣堂的祭台旁。

5月3日，继任的耶稣会中国传教区总负责人龙华民来到北京。葬礼要由他来主持。他亲自指导设计了在中国的第一座天主教公墓——在花园的一端，盖一所圆顶六角底座的小亭，称为丧礼教堂。亭的两边，各造一道圆弧形的墙。在花园的四棵翠柏之下，为神父修造了砖砌墓穴。从此，翠柏就忠实地为这位长眠北京的远方来客遮阴守墓。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11月1日，在被天主教称为“诸圣节”的这天早晨，教友们陆续来到圣堂。他们手持蜡烛，燃着乳香。气氛隆重而肃穆。在风琴的伴奏声中，举行完该日弥撒



1615年利玛窦墓地平面示意图 “脊纹，螭之岐其尾；肩纹，蝶之矫其须；旁纹，象之卷其鼻”。墓地的南面，为一二重院落，堂前立一石晷，以纪念利神父在天文历法方面的贡献。石晷底座上的铭文曰：“美日寸影，勿尔空过，所见万品，与时并流。”

该书的作者刘侗和于奕正行文极为严谨，于奕正负责收集资料，刘侗负责成文，二人又互相监督，“事有不经不典，侗不敢笔；辞有不达，奕正未尝辄许也”。写到未曾见过的景点，必亲自前往勘踏，因此，他们的描述是极为可信的。

书中收集了当时一位名士谭元春的《过利西泰墓》诗：“来从绝域老长安，分得城西土一棺。磔地呼天心自苦，挟山超海事非难。私将礼乐攻人短，别有聪明用物残。行尽松楸中国大，不教奇骨任荒寒。”（松楸：古人墓地常植松树、楸树，所以松楸即指墓地。）

《帝京景物略》还记道，在利氏坟墓的左侧而葬者，是“其友邓玉函”。作者显然对邓玉函很熟悉，说他精通西医，他所著的《医说略》称：西药是从该国草木中“蒸取其露”而得，

之后，神父们肃立在利玛窦的棺木前，朗诵了《死者祭文》，接着又做葬礼弥撒，最后致悼词。圣堂里的仪式完毕后，教友们抬着棺木缓缓走向墓地。他们边走边哭，为失去这位可尊敬的良师挚友而悲恸。行进在队伍中的徐光启，已是满面泪痕，他忍住悲痛，亲自持绳将棺木放入墓穴中。他们在墓前行礼，又到奉在六角亭中的耶稣像下跪拜，然后慢慢离去。从此，这位来自泰西的外国友人，就与苍松翠柏覆盖的“滕公栅栏”永远地融为一体，“滕公栅栏”这一名字也逐渐闻名世界了。

(二)

利玛窦安葬后不久，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发生了南京教案，皇帝颁布谕旨，令在京之西洋人俱归澳门，又严禁中国人信教。龙华民与在京之耶稣会士俱出都南归，“有本会之二会昆原系中国人，不在驱逐之列，令其暂守利玛窦之坟”（《燕京开教略》）。其余教堂院落则都被官府封禁。

1630年另一名传教士邓玉函（Joannes Terrenz）病故，就安葬在“滕公栅栏”墓地，成为永久陪伴先行者利神父的最早的人。

崇祯八年（1635年）出版了一本记述当时北京景物的书，名叫《帝京景物略》。书中详尽地描写了利玛窦墓地的景色。文中写道：利玛窦的坟与中国通常的样式不同，“下方而上圆，方若台圯，圆若断木”，坟后为一六角“虚堂”（即亭子），供奉着十字架。后墙饰有花纹，

“所论治法，每及人体精微”。他只要尝尝中国草药的味道，便可知“叶形花色，茎实味香”。他曾打算将中草药“遍尝而露取之”，即今人所说的“中药西制”，并撰写成书，然未竟而卒。

在邓玉函之后相继去世，并葬于利玛窦墓地的是罗雅谷（Giacomo Rho）和龙华民（Nicolaus Longobardi）。龙华民 1559 年生于意大利的西西里，1597 年到中国，先后在北京和济南传教，1654 年，即清顺治十一年，终以 95 岁的高龄死于北京。送葬那天，“北京便又成了一次大规模的宗教殡葬仪式的目击之地了。皇帝赐治丧银，……并且令人把这位他所很敬仰的人物底影像画了下来，画像穿着白色祭衣，坐了教坛上作进道之姿势”。（《汤若望传》第 330 页）

（三）

使“滕公栅栏”传教士墓地得以扩大的，是日尔曼籍耶稣会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汤若望曾为明室修历，参与了《崇祯历书》的编纂。1644 年，明王朝倾覆，清兵入主北京。汤若望在兵荒马乱之中，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清兵入城后，下令“内城居民，限三日內，尽行迁居外城等处，以便旗兵居住”。住在宣武门内天主堂的汤若望冒着违令受惩的危险，上疏朝廷，称：“曾奉前朝故皇帝令修历法，著有历书多帙，付工镌版，尚未完竣，而版片已堆积累累；并堂中供像礼器、传教所用经典、修历应用书籍并测量天象各种仪器，件数甚伙。若一并迁于外城，不但三日限內不能悉数搬尽，且必难免损坏，修整既非容易，购买又非可随时寄来。”因而恳请“仍居原寓，照旧虔修”。（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存，引自《中国教案史》第 5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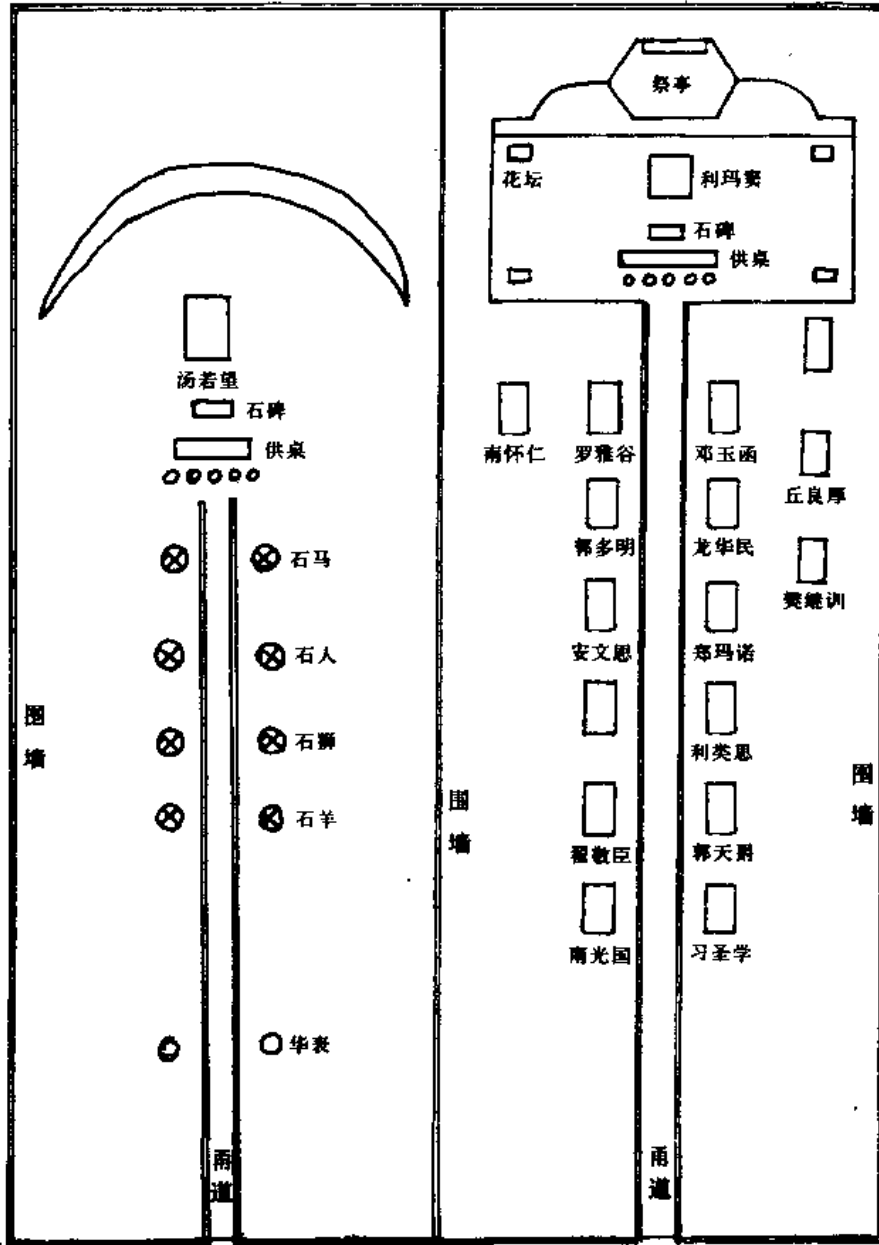
颇为开明的新统治者，第二天便传谕：“恩准西士汤若望等安居天主堂，各旗兵弁等人，毋许阑入滋扰。”（同上书第 56 页）

不久，汤若望又多次奉召入朝，呈献天文仪器及舆地屏图，论说新历之长。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采纳了汤若望的建议，决定于顺治二年开始，将汤若望等编纂的新历颁行天下。继而任命汤若望为清王朝的钦天监监正。

1651 年（顺治八年）多尔衮死，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亲政。福临虽笃信佛教，但对汤若望的道德学问非常钦佩，先后赏他“通政大夫”、“太常侍卿”、“通玄教师”等多种封号，并亲切地称他为“玛法”。汤若望“每日随意出入朝中，凡有启奏，俱准迳入内庭，不循常例”。皇上“亦屡幸堂中，垂问教理”。（樊国梁《燕京开教略》中第 26 页）福临亲临汤若望住处竟达二十多次，还在那里吃饭、喝茶。每当汤若望向皇上呈献图书和仪器时也总能获得诸如衣服、绸缎和钱财的赏赐。1654 年，有一次当皇上问及他还需要什么的时候，汤若望便流露了想在利玛窦墓旁获得一块基地的愿望。皇上欣然应允，将那块珍贵的地产赐予了他。此处原属一位亲王所有，皇上遂另赐一地，对那位亲王做了补偿。

1660 年，汤若望在皇上赐给他的空地上建了一座圣母小教堂。教堂前树立石碑一块，碑上面用满、汉两种文字刻着以下碑文：

“今皇帝在位十有一年，顺治甲午。臣若望蒙恩矜念，犬马齿衰，赐地一区，以



17 世纪末利玛窦、汤若望墓地示意图

作他日窀穸（意：墓穴）所，以昭异眷也。

窃维九万里孤踪，结知英主。既荣其生，复哀其死。鱼水相欢，得若将终其身，又预为之计，久远如此。宠施优渥，出于格外，岂人力也哉！

古圣贤于遇合之际，率归之天。今予之得遇主上，用西法以定运，进修士以演教。道之将行，日升月恒，殆未可量。又不特一身之感恩称知遇而已，谓非天主上帝默作合于其间，可乎？

用是朝夕输诚，仰图报答，计算如崇祀。乃于赐地之中央构榭，内供圣母抱天主耶稣，名圣母堂，以资焚祝。自是岁时趋谒，行弥撒礼，诵祈普庇无致（意：厌）。而奉教友辈，有造门瞻叩申虔者，其务识所从来，伏祷上佑曰：致吾君为免舜，

绵国祚于无疆。斯为实获我心者矣。

顺治十七年岁次庚子孟秋谷旦

敕赐通玄教师通政使司通政司加二品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汤若望撰”

谁料，顺治皇帝福临年仅二十四岁便过世了。八岁的爱新觉罗·玄烨登基，年号康熙。当权的辅政大臣鳌拜等力主恢复祖制，排斥西洋科学，汤若望也遭诬陷，原赐墓地被收回。出狱后忧愤而死。1669年（康熙八年）玄烨亲政，除掉鳌拜等人，为汤若望平反，并赐银五百二十五两，派大员在福临所赐墓地上为汤若望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更亲笔撰写祭文以示纪念。祭文中曰：“尔汤若望，来自西域，晓习天文，特界象历之司……遽尔去逝，朕用悼焉。特加恩恤，遣官致祭。”

葬礼上，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等人跪着聆听了特使在墓前宣读的祭文。一位外国神父还记述了玄烨亲自来悼念汤若望的情景。他写道，皇帝亲自随同他的皇祖母，以及朝中最高之大员莅临汤若望之墓旁，依照中国之礼俗，向死者致敬。这在一位中国皇帝，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汤若望传》第536—537页）

从此，滕公栅栏的传教士墓地几乎扩大了一倍，在—道墙的东西两侧，汤若望与他的前辈利玛窦相伴而眠。墓地入口处悬挂着一幅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的“钦赐”匾额。他的坟墓比利玛窦的更为壮观。1726年《新世界报》载文详论说：“汤若望神父安息在一座真可以说帝王一般的墓地之上。”（《汤若望传》第556页）

另一位得到皇上赐碑殊荣的是比利时籍耶稣会士南怀仁。南怀仁原是汤若望的助手，鳌拜当政时期也遭到迫害。玄烨亲政后，令其再度主持钦天监，撰成《永年历书》三十三卷，又依西洋方法铸炮。玄烨曾亲临炮场试放，对其大加褒奖。这些大炮在平定吴三桂等人的叛乱中发挥了威力。平日，他还常常为皇上传授西洋科学知识，深受皇上器重，被擢为工部侍郎。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1月28日，南怀仁病歿。玄烨亲撰碑文，称：“尔南怀仁，秉心质朴，肆业淹通。远泛海以输忱，久服官而宣力……既协灵台之掌，复储武库之需……可谓莅事惟精，奉职弗懈者矣。遽闻溘逝，深切悼伤，追念成劳，易名勤敏。”

南怀仁以及在他以后过世的葡萄牙的郭天爵（Francisco Simoes），法国的翟敬臣（Charles Dolze）、南光国（Louis de Pernon）、樊继训（Pierre Fropperie）、习圣学（Charles de Broissia）和比利时的安多（Antoine Thomas）等耶稣会士，仍安葬在墓地东侧的利玛窦墓前。第一个葬在汤若望坟前的是1709年逝世的徐日升（P. Thomas）。（徐日升的墓碑至今尚未找到，但碑文拓片尚存）接着是日尔曼籍的庞嘉宾（Gaspar Kastner）等人依次葬在汤若望坟前。渐渐地，汤若望墓地的传教士坟茔与利玛窦墓地—样，也连成了长长的一列。后来，那段分隔两处墓地的矮墙，被—条甬道代替，从此，两处墓地便合而为一了。

（四）

爱新觉罗·玄烨，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赞赏西方科学，器重有真才实学的传教士。对他们传播天主教义，发展教徒，也取宽容态度。但是他牢牢地把握住—点，即外国传教士不得干涉中国的内政。

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玄烨转而禁教。这完全是因罗马教廷的错误政策导致的，矛盾集中体现在中西的“礼仪之争”。

中国自古重视孝道，有祭祖的风俗，此外，被尊为“万世师表”的孔子，也常常受到读书人的祭奠。但天主教规定，教徒只能敬天主，否定其他一切偶像崇拜。以利玛窦为首的一批耶稣会士，为了减少传教阻力，一直尊重中国的传统习俗，不反对教民参加祭祖、敬孔活动。这使他们的传教活动在中国土地上站住了脚。然而，随后来华的多明我派、方济各派传教士则对此大加攻击，将矛盾一直闹到罗马教廷。1656年（顺治十五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做出裁定，准许耶稣会士按照他们的意见行事，对中国那些含有迷信的礼节、丧葬等仪式，只要不妨害教徒的根本信仰，均可自由参加。

耶稣会虽然在这一回合取胜了，但矛盾并未就此解决，反对派仍然坚持己见。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教皇格来孟十一世推翻前议，做出禁止中国教民参与祭祖、敬孔活动的决定。

玄烨本来还想挽回僵局，他正式发布上谕解释说，中国的祭祖祀孔不过是一种崇敬礼节，是纪念先祖过去的善行，并无宗教性质，他还遣传教士白晋等到罗马谒见教皇，谋求一项折衷调和的解决办法。但教皇蛮横无理，拒绝任何妥协，并且颁布谕令：凡教士不遵守禁令者，将受到逐出教会的惩罚。1773年教皇还下令解散了耶稣会。

玄烨于是大怒，他下令逮捕了宣布教皇禁令的主教，在教皇的公文上批道：“欧洲人没有资格批评中国的礼节。”（陈垣《康熙与罗马教皇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十一）并降旨：“从今而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同上书影印本二）他向“遵利玛窦的规矩”的耶稣会士发了准予传教的印票，其他不服从中国礼仪的，则不予发票，令其取道澳门返回欧洲。

从此以后，包括雍正、乾隆、嘉庆在内的历朝，中国政府对天主教均采取了“禁”的政策，虽然时紧时松，与此同时又仍容纳了一批“遵利玛窦的规矩”的传教士在宫廷服务，“重其学，不重其教”。对一些杰出的传教士仍然委以重任。

这一期间，在北京的教堂多有毁坏，只有滕公栅栏墓地因暂交俄国修道院代管而一切设施保存完好，并陆续收纳了一位又一位远方来客的遗骨。这其中有历任钦天监正、监副戴进贤（Ignatius Koegler）、刘松龄（Augustin von Hallertein）、鲍友管（Gogeisl）、傅作霖（Joao de Seixax）、高慎思（Jose d'Espinha）、福文高（Dominic Joachim Ferreyra）；参与绘制中国地图的山遥瞻（Guillaume Bonjour Fabre）、汤尚贤（Pierre Vinecent de Tartre）、费隐（Ehernbent Xaver Fridelli）；还有绘画大师郎世宁（Ginseppe Caseiglione）和几位医师、钟表师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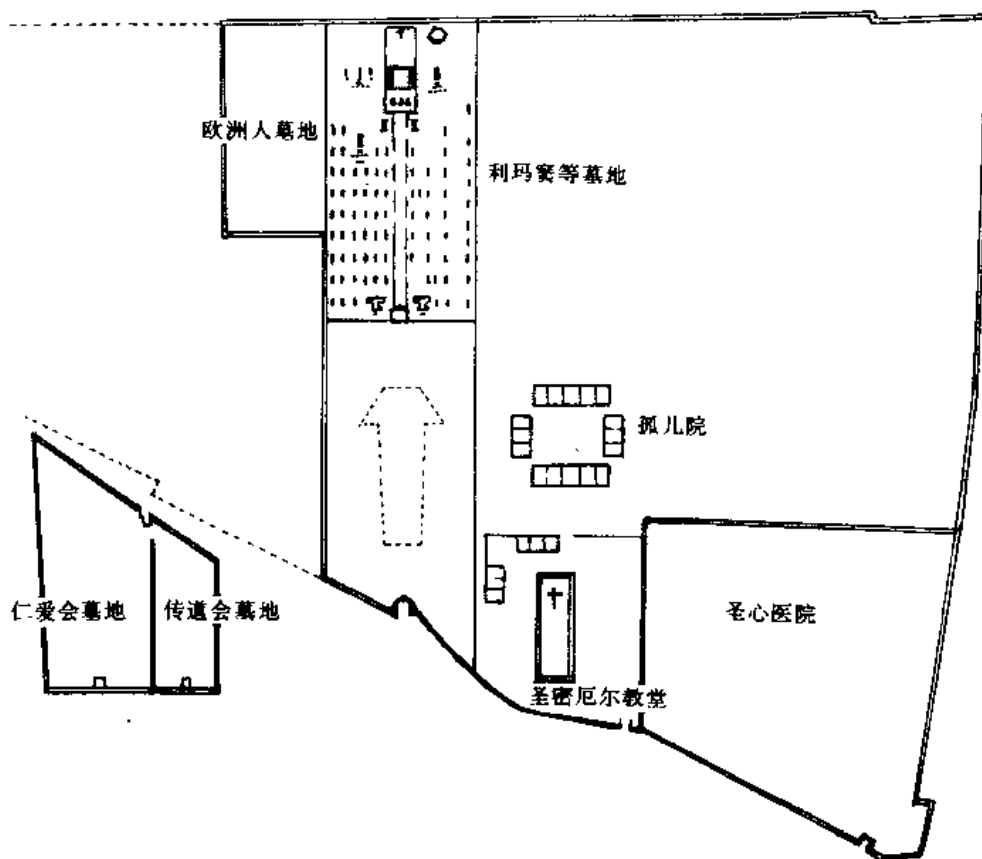
（五）

19世纪以后，欧洲发生了变化，天主教教会发生了变化，古老的中国也发生了变化。滕公栅栏这块小小的传教士墓地的命运也经历了一波三折。

由于产业革命的发生，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飞速发展，欧洲成了世界的中心，它向外扩张的形式，不再仅仅利用教会的十字架，而更主要的是依靠强有力的无敌炮舰和廉价商品，一步步地把世界都变成它的殖民地。

欧洲早期海外殖民强国葡萄牙和西班牙，渐渐地被后来居上的英国和法国所代替。天主教的保教权也从葡萄牙转移到法国国王手中。接踵来华的传教士越来越显露出其殖民主义的嘴脸，越来越直接地为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政策服务。于是，宗教成了政治的一部分。

在封建制度的束缚下，在日益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下，中国则一步步地走向衰落。1840年，英国用大炮和鸦片轰开了中国的大门，随之而来的各国列强在迫使中国签订各个不平等条约中，明确规定了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的自由。清王朝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传教禁令，被迫放弃了。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反对教会成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剥削的一种方式，各地教案迭起，终于酿成了席卷北方大地的义和团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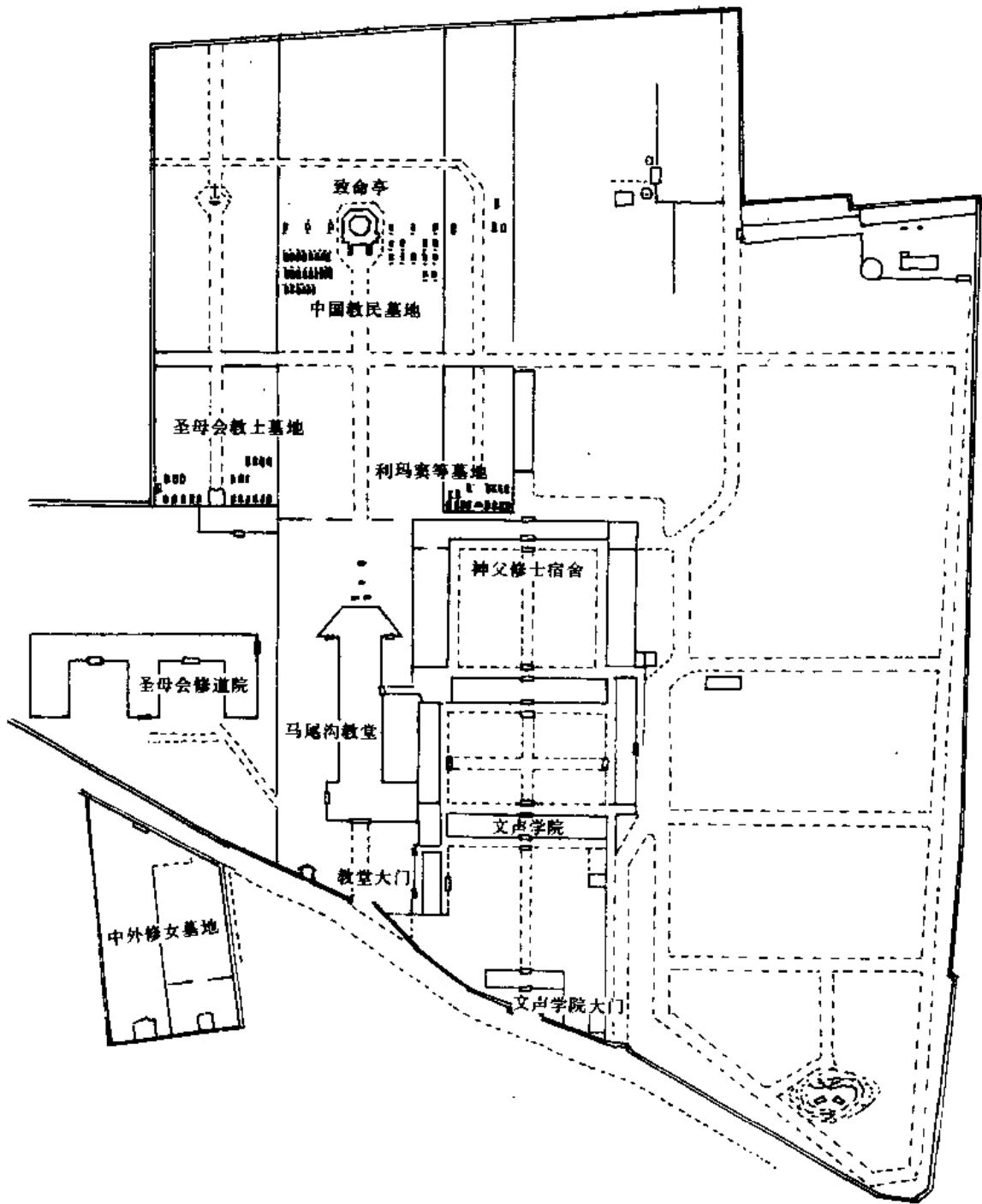


1900年滕公栅栏墓地示意图

这里有一张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前的滕公栅栏墓地平面图。我们看到它有了多大的扩展，原来的利玛窦和汤若望墓地，被称为葡萄牙墓地，仅占了图中很小的一部分。在它的正南，原有的中国式建筑已荡然无存；在其东南，分布着“品”字形的育婴堂、圣密厄尔教堂和圣心医院；它的西南，是一片中外修女的墓地；它的正西，紧挨着的是新辟的非神职欧洲人墓地，一些客死在中国的洋外交官就埋葬在这里。据记载，这时“葡萄牙墓地”中已经葬有八十八位传教士（其中有中国籍的司铎若干人）。

在义和团反洋人反洋教的高潮中，滕公栅栏墓地遭到洗劫。墓碑被推倒、砸碎，墓穴被挖开，其它建筑也被毁坏。

不久，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



1900年栅栏墓地示意图

约)。条约的第四款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在诸国被污渎及挖掘各坟茔，建立涤垢雪侮之碑，由各国使馆督建，并由中国国家付给估算各费银两。京师一带，每处一万两。其建碑之坟茔，英国一处，法国五处，俄国一处。”（《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第1075页）

由于法国取得天主教保教权，滕公栅栏墓地也就成了法国的一处坟茔。

代表清政府处理善后的全权大臣奕訢，派内阁侍读学士张翼与主教林懋德商办具体事宜。俄国驻京参赞罗达诺夫斯齐克亦参与会商。后张翼另有任用，即由直隶布政使周馥和云南盐法道李毓森与教会接洽。周馥连日分往各处坟茔踏看。他在奏折中写道：“阅法国茔地各碑，有顺治、康熙年间汤若望、南怀仁供职钦天监有功，恩礼优渥，予谥赐葬。以后效力外臣，赐葬银者甚多。今横遭此乱，莫不仆碑破冢，实属惨目。”（同上书，第1071页）

按照列强的要求，中国政府出银一万两，重修了墓地。除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徐日升、龙华民、索智能及中国的李保禄等六人的墓碑单独树立外，剩下七十七尊墓碑被嵌入新建的教堂外墙。几名神父将附近被杀的中外教民的尸骨葬于一处，上面砌成三米高的六角形坟丘。坟丘上又建一六角形小亭，称为“致命亭”。亭子座基六面的青石墙上，镌刻着死者的姓名和籍贯。但被联军杀害的无数平民百姓和义和团团员则仍暴尸街头。

根据列强的要求，清政府在各使馆的监督下还专门立了所谓“涤垢雪侮”，而实际是铭刻耻辱的石碑。碑文写道：“中国朝廷为已亡诸教士雪侮涤耻，特发帑银一万两，重新修建。勒于贞珉，永为殷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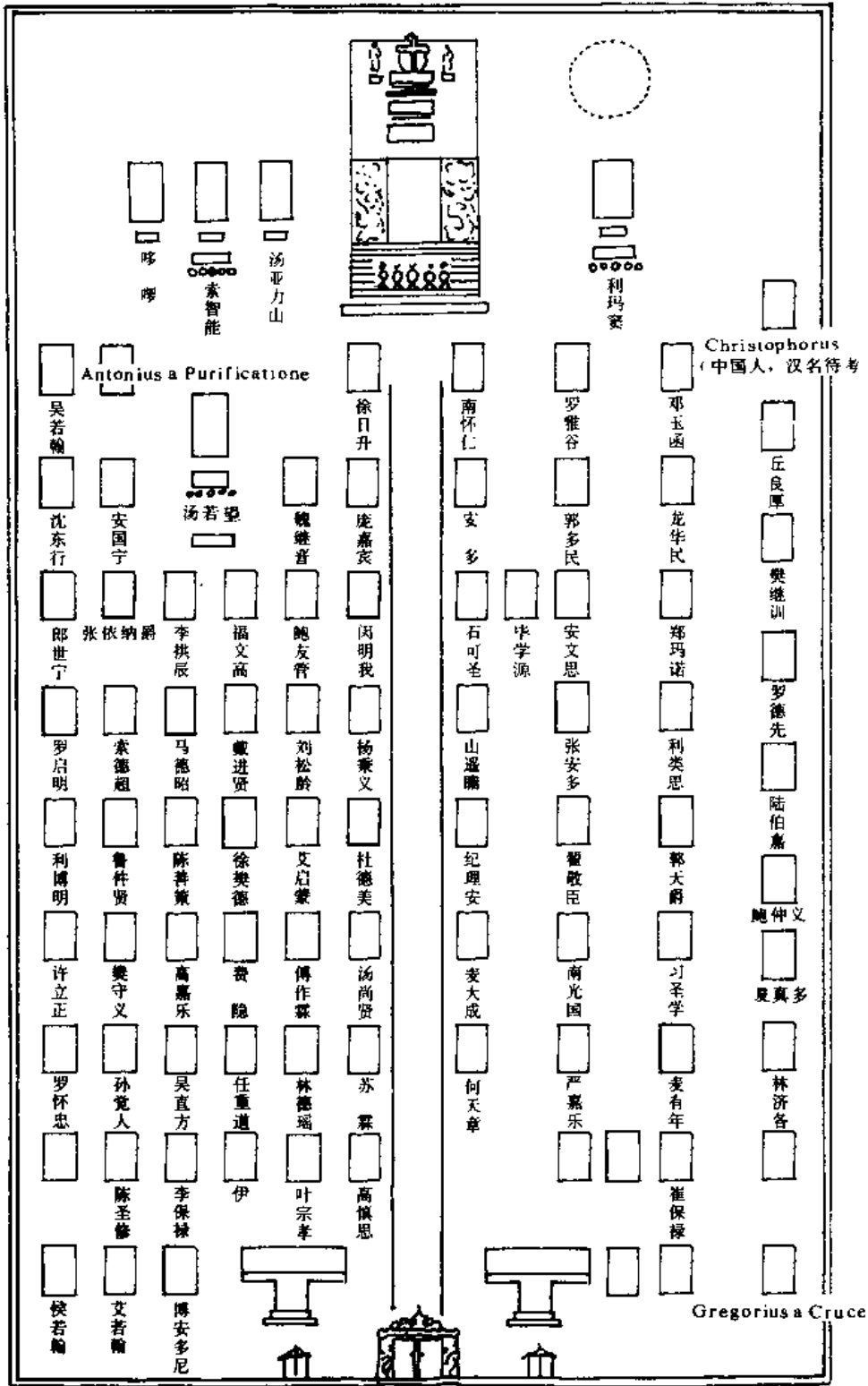
此后，以滕公栅栏为中心的教会产业又进一步扩展。1906年，慈禧太后与法国公使商量，出资在教堂的正西修建一座“山”字型圣母修道院，将原来位于府右街北面的法国圣母会及修道院迁至滕公栅栏。后来，这幢楼的一部分成了圣母会所属的教会学校。又在被毁的育婴堂和圣密厄尔教堂的遗址上，新建了一幢“口”字形三层楼房和一些平房，作为专门培养神父的神学院——“文声学院”。此外还创建了葡萄酒厂，在墓地四周围种上了大片的葡萄。

“滕公栅栏”成了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国中之国。葬入这块墓地的中外籍神父也越来越多。

（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政府惩治了隐藏在教会中的特务分子，驱逐了敌视新中国的外国神父，同时保障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滕公栅栏在解放初期一切依旧。

1954年，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开始筹建，北京市政府以十万元购买了“山”字形楼和“口”字形楼两幢建筑。教会小学迁至车公庄大街以北，即现在的进步巷小学；酒厂迁至石景山区重建，即今北京葡萄酒厂。对于传教士墓地的处理，有关人员直接请示了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处。根据上级精神，决定将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三位尊重中国人民传统习惯并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较大贡献的耶稣会士坟墓在原址保留，龙华民、徐日升、索智能三尊墓碑移至教堂后院，其它传教士和教民的遗骨及墓碑，则迁至海淀区西北旺乡新辟的十六亩墓地内。教堂不仅继续保留，而且还照常举行宗教活动。而嵌在教堂外墙的七十七块明清时代的传教士墓碑，也被留在“滕公栅栏”原址。



1927年滕公栅栏墓地示意图

1956年9月，党校建成开学。传授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学校，与传播有神论的教堂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每逢礼拜天，钟声一响，远近教民熙熙攘攘汇聚于教堂里，唱圣歌，听布道，好不热闹。党校学员到教堂南面的操场锻炼，从这里路过，总要好奇地隔窗而望，有的干脆走进教堂，去观看虔诚的信男信女对他们的主是怎样顶礼膜拜的。而山字楼和口字楼则成了党校的食堂和职工宿舍。

1958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将这座教堂赠与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成为学校的一座仓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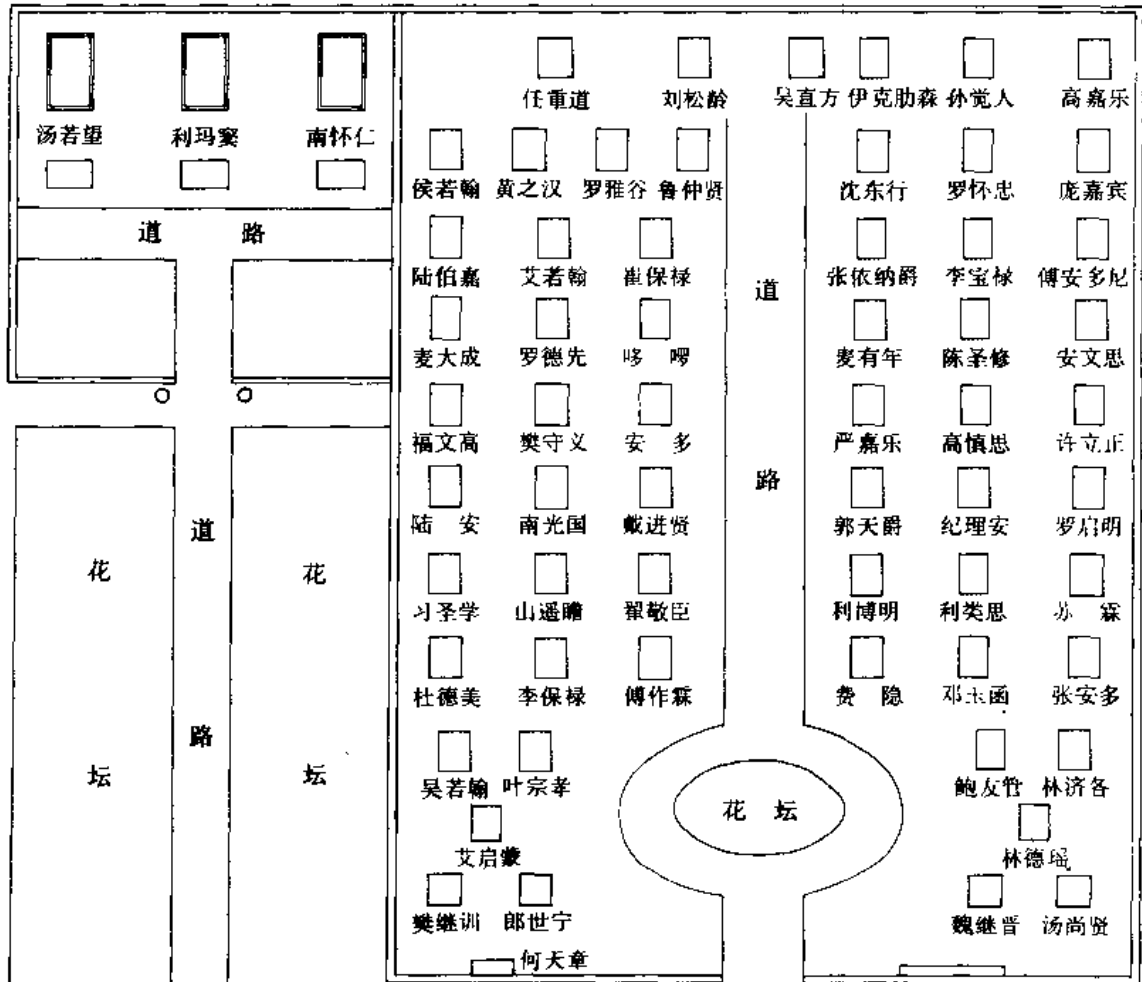
1966年以前，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人的墓地，一直都是受北京市文物局管理保护的文物。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的工作人员每年都来此视察几次，并向党校管理人员介绍三位教士的事迹，宣传文物保护常识。

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8月15日，新任命的校长第一天上班，就接待了一批来自附近一所学校的红卫兵。他们责问：为什么还不拆除外国人的墓碑？限你们三天必须拆掉！校领导当即请示市委和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由于当时许多机构都已瘫痪，无法得到上级的处理意见。此时，党校的一位工作人员建议，将利玛窦等人的墓碑就地深埋，以便使文物得到保护。第二天，那些红卫兵按时来到，见墓碑依旧，十分不满。党校那位工作人员对他们说，“就等你们来一块儿拆。大家齐动手挖个坑，把碑埋起来，叫它永世不得翻身，你们说好吗？”天真的学生对这一处理方法的“革命性”表示了认可，于是在党校工作人员的指挥下，学生们在原来三块墓碑的前方挖了三个一米多深的坑，用绳子小心地将碑拉倒，用土埋了起来。忙了整整一天，满头大汗的学生心满意足地走了。利玛窦等三人的墓碑就这样入土为安，就这样被保护起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市委党校被撤消。原校舍和办公室改为国务院第四招待所。1973年招待所需建一处食堂，于是建议将多年失修的旧教堂拆掉，在教堂原址上修建食堂。文物部门不同意这样做，但因得到当时北京市有关领导人的批准，教堂还是被拆除了。滕公栅栏基地的天主教堂从此永远消失，嵌在教堂外墙的七十七块传教士墓碑和那块耻辱碑都散落在院中各处。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包括宗教政策在内的党的各项政策开始得到恢复和落实。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访欧代表团归来，向中央提出恢复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人墓地的建议，立即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批复。于是北京市民政局和文物局共同重建了墓地。深埋了十二年的三位传教士墓碑依然完好。利神父的碑经磨平重刻后，按原样用砖砌好。汤、南二神父碑依旧分列两旁。在翠柏的掩映下，又恢复了旧日的风采，成为党校一景。来自北京乃至全国各地的干部，常在课余或饭后散步时，到这里驻足片刻。很多人由此知道了这三位异国友人的名字。1984年，这处明清传教士墓地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1984年，在北京市文物局的协助下，市委党校出重资扩建了传教士墓地。在利玛窦等人墓地的东侧专辟一院，将原来嵌在教堂外墙后散落在院中的六十块石碑以及那块作为历史见证的“耻辱碑”重新竖立起来。北京市文物局还将所有碑文拓印存档。

到目前为止，作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明清传教士墓地”共保留六十三名传教士的墓碑。其中十四人来自葡萄牙，十人来自意大利，九人来自德国，九人来自法国，此外还有捷克三人、比利时二人、南斯拉夫一人以及不明国籍者一人，以及十四名中国籍教士。这六十三块墓碑，不仅铭记着那些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它们本身也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石碑的顶部有的刻以龙盘，有的饰以祥云，这是显示着墓主身份不同等级的标志。碑的



栅栏墓地现状示意图

底座多有鹤、鹿及二龙戏珠等饰物，用中国的传统手法象征富贵、吉祥和长寿。而碑顶的十字架和 IHS 的拉丁文字母，则是西方天主教和耶稣会的标志。

近年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滕公栅栏这处古老的墓地，也愈益受到各界的关注，前来观光、凭吊和进行学术交流的中外人士络绎不绝。

滕公栅栏传教士墓地从接纳利玛窦神父遗骨至今，已经三百八十多年了。在这三百八十年的漫长岁月中，世界发生了原子裂变般的变化，中国成就了多少兴革，墓地也经历了几度沧桑。今天，终于到了人们能够公正科学地评价历史，臧否人物的时代了。在神州大地激荡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时候，我们站在这幽静的古墓前，难道不能悟出一点历史的真谛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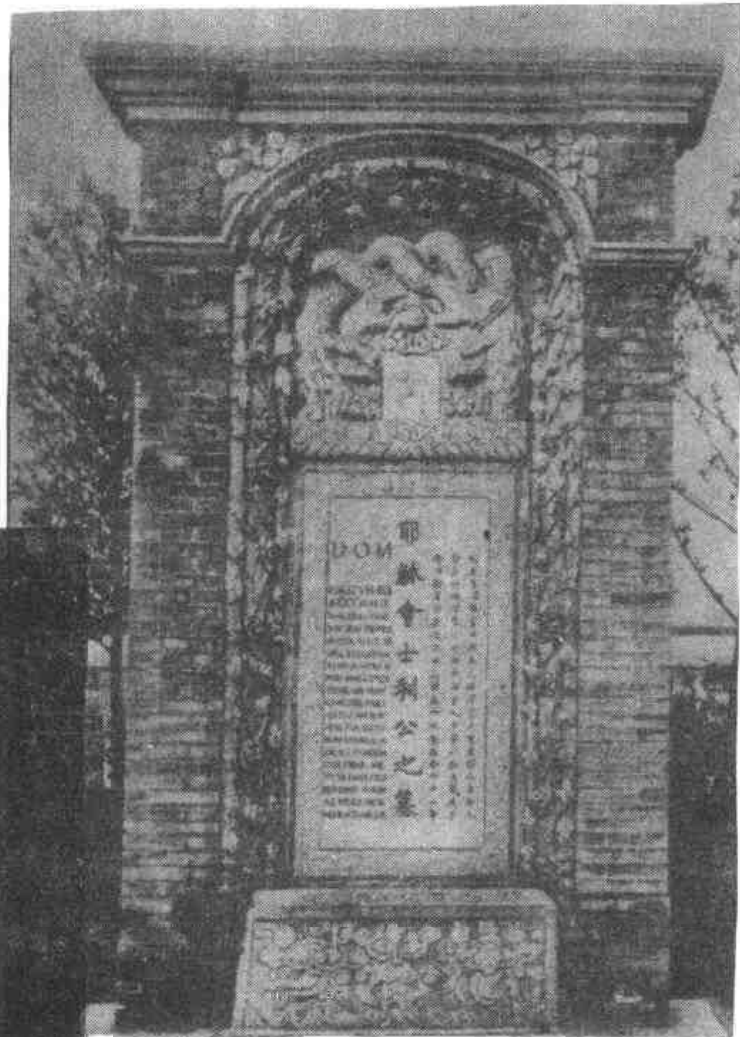
栅栏墓地碑文录

编号 01

碑文:

耶稣会 (1) 士利公之墓

利先生讳玛塞,号西泰 (2),大西洋意大利亚国 (3)人。自幼入会真修 (4)。明万历壬午年 (5),航海首入中华传教,万历庚子年 (6)来都,万历庚戌年 (7)卒,在世五十九年 (8),在会四十二年 (9)。



注释:

(1) Society of Jesus,天主教修会之一。1534年由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创建于巴黎,1540年经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批准。16世纪成为天主教会反对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集团。该会仿效军队编制组成,强调会士须绝对效忠教皇。明末传入中国。1773年教皇克雷芒十四世宣布解散该会,1847年教皇庇护七世又予恢复。

(2) 原名 Matteo Ricci。作为耶稣会传教士,他第一个进入明朝首都北京,开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局面,是当时对于中国社会上层集团、文化学术界人士和传教事业最有影响的人物。

流的新局面,是当时对于中国社会上层集团、文化学术界人士和传教事业最有影响的人物。

〈3〉 意大利。1552年10月6日生于马塞莱塔 (Macerata)。

〈4〉 1571年8月5日入会，1580年7月25日晋铎，1596年任中国耶稣会会长。

〈5〉 1582年、1578年，利玛窦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出发，经印度果阿，1582年8月7日到达澳门。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和罗明坚到达广州肇庆，是为传教士入中国内地开教之始。

〈6〉 1600年。1598年7月，利玛窦等人沿运河北上，9月进入北京，留住两月不能面呈贡礼，只好返回南京。1600年5月18日，利玛窦从南京二次北上，滞留天津五个月，1601年1月24日第二次进入北京城，并获准长驻京城传教、讲学。

〈7〉 庚戌为庚戌之误，即1610年5月11日。

〈8〉 碑文中的年龄均按中国传统的虚岁计算。

〈9〉 在会时间应为三十九年，碑文有误。

编号：02
碑文：

耶穌會士鄧公碑



耶稣会士邓公之墓

邓先生讳玉函，号函璞（1），大西洋入尔玛尼亚国（2）人也。明天启辛酉年（3），来中华新教，乙丑年（4）入京都。崇禎初年（5）上命修历，庚子年卒（6），寿五十有四岁，在会真修十九年（7）。

注释：

（1）原名 Schreck，但一般熟知的是其拉丁化的名字 Joannes Terrenz。邓公博学多才，来华前已名满本土。来华后，在医学、物理、天文、机械等方面多有贡献。

（2）日耳曼。1576 年生于巴登大公爵国康斯坦茨（今属瑞士）。

（3）1621 年。1618 年，邓随金尼阁等二十二名传教士，携七千部书籍来华。1620 年 7 月达澳门，次年进广州转杭州。

（4）1625 年。

（5）1629 年。

（6）庚子为庚午之误，卒于 1630 年 5 月 11 日。

（7）1611 年入会。

编号: 03

碑文:

耶穌會士羅公碑



耶稣会士罗公之墓

罗先生讳雅谷，号味韶〈1〉，大西洋铁郎国〈2〉人也。于明天启甲子年〈3〉，来中华传教。崇禎庚午年〈4〉，上取修历。崇禎戊寅年〈5〉卒，寿四十有七岁，在会真修二十二年。

注释：

〈1〉原名 Giacomo Rho，在华参加了《崇禎历书》的编译工作，并且第一个指名介绍了伽利略学说中关于星体发光的本质的论说。

〈2〉意大利。1593年1月生于米兰城。1616年入会，1617年晋铎。

〈3〉1624年。1618年4月罗雅谷借金尼阁等来华，于1620年抵澳门，1624年进山西绛州等地传教。

〈4〉1630年。

〈5〉1638年4月26日。

编号：04

碑文：

耶稣会士汤公〈1〉之墓〈2〉



皇帝掄祭原任通政使司
 〈3〉通政使，加二級又加一級，
 掌欽天監〈4〉印務事，故湯若
 望之灵曰〈5〉：鞠躬尽瘁，巨子
 之芳踪。惟死報勤，國家之盛典。
 尔湯若望，来自西域，晓习
 天文，特昇象历之司。爰锡“通
 政教师”〈6〉之号。逮尔长逝，
 朕用悼焉。特加恩恤，遣官致
 祭。嗚呼！幸垂不朽之榮，庶享
 匪躬之報。尔也有知，尚克歆
 享。康熙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7〉。

汤先生讳若望，号道未，大
 西洋日尔玛你亚图〈8〉人也。自
 幼入耶稣会〈9〉。于明天启甲子
 年〈10〉，来中华行教。崇禎庚
 子年〈11〉，钦取修历。至顺治
 二年〈12〉，清朝特用新法，恩
 賚有加。卒于康熙四年乙巳
 〈13〉，寿七十有五。

注释：

〈1〉原名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对天文数学均有研究。在华期间参加《崇禎历书》的编译、修订工作，在天文仪器的引进、仿制和西式火炮的监制等方面也有建树，是活跃于明清之际著名的传教士之一。

〈2〉此碑约在1900年重修时改

碑阳面北而立，原因待考。碑正面有皇帝祭文的满、汉两种文字。将满文刻于碑阳，这是墓地中唯一的一例。

〈3〉古代官署名，简称通政司。职掌收受各省题本，送内阁办理。

〈4〉古代官署名。掌管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历法。

〈5〉碑刻“灵曰”与“耶稣”二字重叠在一起。

〈6〉锡为赐之误。1653年4月2日，顺治皇帝赐予汤若望“通玄教师”尊号。后康熙避讳改“玄”为“微”。

〈7〉1669年12月8日，距汤若望去世已三年多。

〈8〉日耳曼。1591年出生于德国科隆一贵族家庭。

〈9〉1611年入会。

〈10〉1624年。此处碑文有误。1618年4月16日汤若望借金尼阁等教士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出发，于1620年7月抵达澳门。1622年进广州，旋往北京学习语言，不久奉派陕西传教。

〈11〉庚子为庚午之误，即1630年。该年5月，邓玉函病逝。6月徐光启上疏推荐汤若望、罗雅谷来京修历，获得批准。十二月初二汤由西安到京。

〈12〉1645年。1644年年底礼部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五级正品）。

〈13〉乙己为乙巳之误，即1665年。此处碑文有误，实卒于1666年8月15日。



编号：05

碑文：

耶穌會士安公碑



耶稣会士安公之墓

上谕：“谕今闻安文思〈1〉病故，念彼当日在世祖章皇帝时，营造器具有奉上意，其后管理所造之物无不竭力，况彼从海外而来，历年甚久，人质朴夙著。虽负病在身，亦期愈治瘥可，不意长逝，朕心伤恻。特赐银二百两、大缎十匹，以示朕不忘远臣之意，特谕。”康熙十六年四月初六日。〈2〉

安先生讳文思，号景明，大西洋路□〈3〉大尼亚国〈4〉人也。自幼入会真修〈5〉。明崇禎十三年〈6〉庚辰，来中华传教。大清顺治五年〈7〉戊子入都。卒于康熙十六年〈8〉丁巳，寿六十有九，在会□修五十二年。〈9〉

注释：

〈1〉原名 Gabriel de Magalhaes，通机械学。在华期间，与利类思一同传教四川，曾被张献忠俘掳。清兵入关，肃亲王豪格送二人至京。

〈2〉1677年5月7日。此谕刻于碑阴。

〈3〉此处碑文字迹不清，难于辨认。以后碑文中遇有此类情况，均以“□”代之。

〈4〉葡萄牙。1609年生。

〈5〉1625年入会，时年16岁。

〈6〉1640年。

〈7〉1648年。

〈8〉1677年5月6日。

〈9〉此段碑文刻于碑阴。

编号: 06

碑文:

耶稣会士利公碑



耶稣会士利公之墓

上谕：“谕南怀仁等：今闻赵昂来奏，利类思（1）年老久病，甚是危笃。朕念利类思自世祖章皇帝（2）时，至于如今，致力多年，老成质朴，素知文翰□□□俱系海外之人。利类思卧病京邸，绝无亲朋资助，深为可悯□特赐银二百两、粮十石，以示朕优念远臣之意，特谕。”康熙二十一年九月初七日。（3）

利先生讳类思，号再可，大西洋意大利（4）国人也。自幼入会真修（5）。明崇禎十年（6）丁丑，来中华传教。大清顺治五年（7）戊子入都。卒于康熙二十一年（8）壬戌，寿七十有七，在会真修六十年。（9）

注释：

（1）原名 Lodovico Buglio，第一个传入西方生物学等知识。

（2）清顺治帝福临。

（3）1682年10月7日。此谕发于利公卒前几日，康熙帝特遣侍卫捧上谕到堂内宣读，南怀仁等恭聆，葬礼照安文思卒后情形办理。该谕刻于碑阴。

（4）意大利。1606年生于西西里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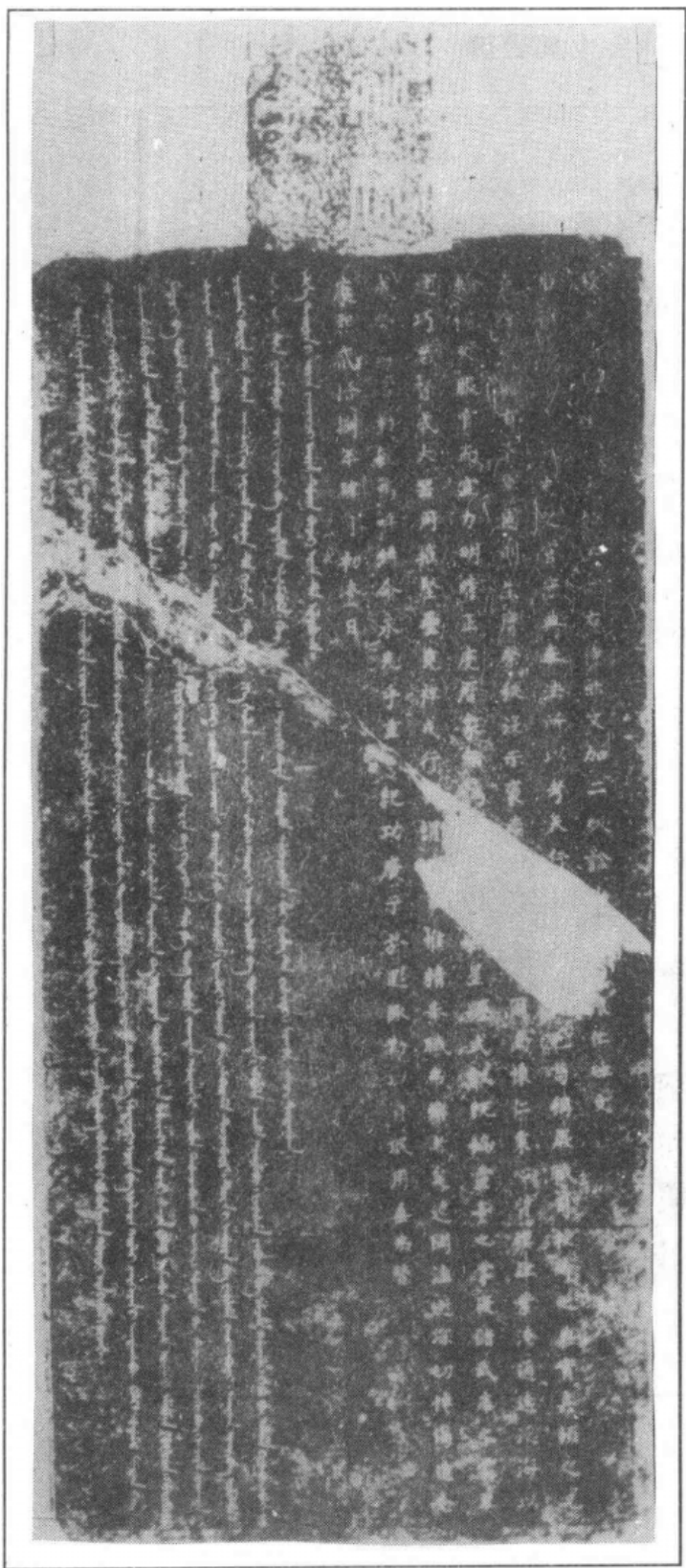
（5）1622年入会。

（6）1637年。

（7）1648年。

（8）1682年。其拉丁碑文记：“1682年10月12日卒于北京，享年七十六岁，在会六十年。以教理、语言、文字及已刊诸书，著称于世。”

（9）此段碑文刻于碑阴。



注释：

〈1〉原名 Ferdinand Verbiest。来华期间，在天文、地理、兵器等诸多方面皆有贡献，是明初著名的传教士之一。

〈2〉比利时。生于1623年10月9日。

〈3〉1641年入会。1676年任耶稣会中国省区会长。

〈4〉巳亥为己亥之误，即1659年。1657年与卫匡国东渡来华，1659年奉派陕西传教，1660年5月9日奉召进京，助汤若望修历。

〈5〉1689年1月28日。该碑中拉丁文碑文称其卒于1688年1月29日，即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据考其卒于1688年1月28日，拉汉碑文皆有误。

〈6〉工部为封建时代中央官制六部之一，掌管营造工程事项。侍郎，官名，正二品，与尚书同为各部堂官。南怀仁是所有在华传教士中，官阶最高者。

〈7〉此处拟为“勤敏”。西方传教士身后得到谥号者，仅此一例。

〈8〉此处拟为“南怀”。

〈9〉此处拟为“而定岁纪”。

〈10〉此处拟为“崇”。

〈11〉此处拟为“岂有靳焉”。

〈12〉此处拟为“望气占云”。

〈13〉此处拟为“可”。

〈14〉此处拟为“蒞事”。

〈15〉1689年5月19日。在其卒后一年多，帝遣官加祭，谥勤敏。此谕用满汉两种文字同刻于碑阴。墓地中只有汤若望和南怀仁之碑，使用了满文。

编号: 08

碑文:

耶稣会士郭公碑



耶稣会士郭公之墓

郭先生讳天爵，号良贵〈1〉，泰西波尔都噶里亚国〈2〉人。自幼入会精修〈3〉，越一载游小西洋后为越性学师，讲道诱人。四十岁〈4〉始来中华，至真定府〈5〉敷教二年。抱恙赴京四月余，忍苦善终，时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四月十二日〈6〉。在世四十四年，在会二十八年。

注释：

〈1〉原名 Francisco Simoes，事迹不详。

〈2〉葡萄牙。生于1650年。

〈3〉1666年入会。

〈4〉时为1690年。

〈5〉又称正定府，今河北省正定县。

〈6〉1694年5月13日。

耶稣会士翟公之墓

耶稣会士翟先生，译教臣，号慎中〈1〉，泰西拂郎济亚国〈2〉人。缘慕贞修，弃家遁世，在会二十年〈3〉。于康熙三十八年己卯〈4〉，东来中华，传天主教。至康熙四十年辛巳一月十三日〈5〉，卒于口外蒙古，年三十七岁。

注释：

〈1〉原名 Charles Dolze，事迹不详。

〈2〉法兰西。

〈3〉1681年入会。

〈4〉1699年。

〈5〉1701年2月20日。

编号: 10

碑文:

耶穌會士南公碑



耶稣会士南公之墓

耶稣会士南先生，讳光圉〈1〉，号冉宾〈2〉，泰西拂郎济亚国〈3〉人。陈慕贞修，异家遗世，在会二十一年〈4〉。于康熙三十八年己卯〈5〉，东来中华，传天主教。至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十月十五日〈6〉，卒于顺天府，年三十八岁。

注释：

〈1〉原名 Louis de Pernon，音乐家，精于提琴、长笛，是 1699 年清廷小型西乐队成员之一，曾为宫廷制造数种乐器。

〈2〉“冉宾”疑为“用宾”之误。典出《易经》：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

〈3〉法兰西。

〈4〉1681 年入会。

〈5〉己卯为己卯之误，即 1699 年。有资料谓其 1698 年来华。

〈6〉1702 年 12 月 3 日。

编号: 11

碑文:

耶稣会樊公之墓

耶稣会弟子樊，讳继训，号述善⁽¹⁾，泰西拂郎济亚国⁽²⁾人。缘慕贞修，弃家遁世，在会十七年⁽³⁾。于康熙三十九年庚辰⁽⁴⁾，东来中华。至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十月初十日⁽⁵⁾，卒于顺天府⁽⁶⁾，年三十九岁。

康熙四十二年十月十五日⁽⁷⁾报上发来御札内，并谕赫世享：据大阿哥⁽⁸⁾所奏，樊继训病故。似此外科，要实难得，且人品亦优，深为可悯，朕甚悼之。尔可齐集西洋人等，传此旨意，将大阿哥所付赏费之物以赐之。特谕。欽此。即于本月十六日⁽⁹⁾领大阿哥颁发帝金二百两⁽¹⁰⁾、缎十匹。赫世享随带广储司员外郎⁽¹¹⁾安泰⁽¹²⁾、茶膳房人员，费至北堂⁽¹³⁾。宣传旨意，行奠茶酒，并发赏物。因明我⁽¹⁴⁾等齐集恭领，叩头谢恩讫。⁽¹⁵⁾



注释：

- 〈1〉原名 Pierre Frapperie，事迹不详。
- 〈2〉法兰西。
- 〈3〉1686 年入会。
- 〈4〉1700 年。
- 〈5〉1703 年 11 月 18 日。
- 〈6〉府名。明代改北平府置，建为北京，治所在宛平、大兴（今北京市）。
- 〈7〉1703 年 11 月 23 日。
- 〈8〉清朝称年长的皇子为大阿哥，此处指康熙十四年（1675 年）册立的皇二子允礽。
- 〈9〉11 月 24 日。
- 〈10〉传教士卒后，凡有赐赏，多是帑银二、三百两，独大阿哥所赏为帑金。
- 〈11〉清以内务府总辖宫廷事务，下设广储等七司，均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职。
- 〈12〉安泰（Stephanus Rousset），修士，法国人，1719 年来华。曾任御医，随从康熙帝几次巡视各地。1758 年去世，葬于北京正福寺法国传教士墓地。
- 〈13〉即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堂。
- 〈14〉耶稣会士闵明我（Philippus Maria Grimaldi），意大利人，时为钦天监行走。详见 128 页闵明我碑文注。
- 〈15〉此谕刻于碑阴。

编号: 12

碑文:

耶稣会士习公碑



耶稣会士习公之墓

耶稣会士习先生，讳重学，号述台〈1〉，泰西佛郎济亚国〈2〉人。缘慕真修，弃世遁世。在会二十三年〈3〉。于康熙三十七年戊寅〈4〉，东来中华，传天主教。至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八月二十日〈5〉，由水路至山东临清州〈6〉，卒于舟中，年四十四岁。

注释：

〈1〉原名 Charles de Broissia，事迹不详。

〈2〉法兰西。

〈3〉1681年入会。

〈4〉戊寅为戊寅之误，即1698年。

〈5〉1704年9月18日。

〈6〉今山东省临清县。

编号：13

碑文：

耶穌會士安公碑



耶稣会士安多之墓

上谕：“安多（1）自西年（2）以来，于天文历法事宜，甚实致力。今闻遽逝，朕深为矜恻。照赏徐日升（2）例，赐银二百两、大缎十端，以示优恤。送臣之意。特谕李因屏、王道化送去，欽此。”

安先生讳多，号平施，泰西佛郎德里亚国（3）人。自幼入会真修（4）。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岁（5），入中国传教。至康熙四十八年岁次己丑六月念六日（6）卒。寿六十五岁，在会四十八年。

注释：

（1）原名 Antoine Thomas，知天文历法，曾为钦天监监正，并参与对俄外交工作。1696 年和 1702 年两次随驾出关。

（2）徐日升（Thomas Pereira），1612 年来华传教的葡萄牙籍耶稣会士，在安多前一年去世，葬于册档墓地，碑已丢失。

（3）比利时。

（4）1661 年入会。1692—1705 年任耶稣会北京会院院长及中国省区副会长。

（5）1686 年。此处碑文不确，实为 1684 年入华。

（6）1709 年 8 月 1 日。己丑为已丑之误。

编号: 14

碑文:

耶稣会士庞公碑



耶稣会士庞公之墓

庞先生讳嘉宾，号慕斋〈1〉，系泰西热尔玛尼亚国〈2〉人也。自幼入会精修〈3〉。于康熙三十六年〈4〉岁次丁丑，入中华传教。卒于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岁十月初八日〈5〉，年四十五岁，在会二十九年。

注释：

〈1〉原名 Kaspar Castner，精于天文，曾任钦天监监正。

〈2〉日耳曼。

〈3〉1680年入会。

〈4〉1697年。

〈5〉1709年11月9日。

编号: 15

碑文:

奧斯定會士山公碑



奥斯定会 (1) 土山公之墓

山先生讳遥瞻，号景云 (2)，泰西佛罗济亚国 (3) 人也。自幼入会真修。于康熙四十九年 (4) 岁次庚寅，入中国传教，奉命出差云南。五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5)，卒于漫丁地方 (6)，年四十五岁。

注释：

(1) Augustinian Order 又译“奥古斯丁会”，原为隐修会之总称。13 世纪放弃隐修而成为当时天主教四大托钵修会之一。17 世纪 80 年代传入中国。

(2) 原名 Guillaume Bonjour Fabre，擅长地理学，在欧洲已负盛名。在华期间参加《皇舆全览图》的测绘工作，该图是当时世界上工程最大、绘制最精的地图。他和另一传教士费隐负责四川、云南地区。在从事地图测绘工作的传教士中，他是唯一的一位奥斯定会士。

(3) 法兰西。

(4) 1710 年。多罗主教为礼仪问题来华，被康熙帝押解澳门后，教宗格勒门十一世于 1707 年擢其为枢机，派传信部六人送枢机礼冠，山为其一。1710 年 1 月 6 日深夜，山遥瞻等六人晋谒多罗，由山呈上礼冠。

(5) 1714 年 12 月 25 日。

(6) 云南边境孟定。

编号: 16

碑文:

耶稣会罗公碑



耶稣会罗公之墓

耶稣会弟子罗，译德先，号慎斋〈1〉，泰西拂郎济亚图〈2〉人。德慕贞修，弃家遗世，在会四十一年〈3〉。于康熙三十八年己卯〈4〉，东来中华。至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九月二十三日〈5〉，卒于顺天府，年六十九岁。

注释：

〈1〉原名 Bernard Rhodes，来华后本居厦门，因精通外科，善于配药，奉召进京充当御医，颇受重视。

〈2〉法国托罗斯人。

〈3〉1674年入会。

〈4〉1699年。己卯为己卯之误。

〈5〉1715年10月19日。

编号: 17

碑文:

耶稣会陆公碑



耶稣会陆公之墓

耶稣会弟子陆，讳伯嘉，号德普（1），泰西佛郎济亚国（2）人。缘慕贞修，弃家遗世，在会二十三年（3）。于康熙三十九年（4）庚辰，东来中华，至康熙五十七年戊戌閏八月十四日（5），卒于顺天府，年五十七岁。

注释：

（1）原名 Jacques Brocard，机械师。来华后在宫廷修理机械钟表和玩具。伯嘉又作百佳。

（2）法兰西。1561 年生于高卢。

（3）1695 年入会。

（4）1700 年。

（5）1718 年 10 月 7 日。

编号：18

碑文：

耶稣会士纪公之墓

纪先生讳理安，号云凤〈1〉，乘大西洋热尔玛尼亚国〈2〉人。自幼贞修〈3〉。于康熙三十三年〈4〉岁次甲戌入中国，钦命治理历法九载，于五十九年六月二十日〈5〉卒。在会四十七年，享寿六十五岁。

注释：

〈1〉原名 Bernardus Kilian Stumpf，曾任钦天监监正，与戴进贤一起，为北京观象台添置了数种天文仪器。

〈2〉日耳曼。

〈3〉1673年入会。

〈4〉1694年。

〈5〉1720年7月24日。



编号：19

碑文：

耶稣会士杜公之墓

耶稣会士杜先生，讳德美，号嘉年^{〈1〉}，泰西拂郎济亚国^{〈2〉}人。缘慕贞修，异家遁世，在会三十四年^{〈3〉}，于康熙三十九年^{〈4〉}庚辰，东来中华，传天主教。至康熙六十年辛丑十一月初一日^{〈5〉}，卒于顺天府，年五十三岁。

注释：

〈1〉原名 Pierre Jartoux，擅长数学，著有《周经密率》、《求正弦正矢捷法》等书。在华期间参与了测绘《皇舆全览图》的伟业，在测绘工作中，他和另一传教士雷孝思发现地球经度长度上下不一，证实地球为扁圆形，为世界地理学作出了一大贡献。雷孝思 1738 年卒后，葬于北京正福寺墓地。

〈2〉法兰西。生于 1668 年。

〈3〉1687 年入会。

〈4〉1700 年。

〈5〉1721 年 12 月 18 日。



耶稣会士麦公之墓

麦先生讳大咸，号尔章〈1〉，慕西波尔都噶里亚因〈2〉人。自幼入会真修〈3〉。康熙四十九年〈4〉庚寅岁，入中华传教。于雍正元年七月十四日〈5〉卒，年四十七岁，在会三十年。

注释：

〈1〉原名 Joao Francisco Cardoso，来华第二年参加了《皇舆全览图》山东、山西、江西、广东、广西等部分的绘图工作。

〈2〉葡萄牙。生于 1676 年。

〈3〉1693 年入会。

〈4〉1710 年。奉葡王命以名贵礼物呈献康熙皇帝而来华。

〈5〉1723 年 8 月 14 日。

编号: 21

碑文:

圣方济各会士陆公碑



圣方济各会〈1〉士陆公之墓

陆先生讳安，号乐然〈2〉，泰西依大里亚国〈3〉人。自幼入会真修〈4〉。于康熙五十九年庚子〈5〉，入中国传教。卒于雍正元年癸卯三月二十八日〈6〉。在会三十六年，享寿五十二岁。

注释：

〈1〉Francisoan Order、天主教托钵修会主要派别之一，会士间互称小兄弟，故又名小兄弟会。10 世纪末、14 世纪初有会士在中国北京、泉州等地活动，17 世纪再次派会士来中国。

〈2〉原名 Angelo de Burgo，事迹不详。

〈3〉意大利。

〈4〉1688 年入会。

〈5〉1720 年。

〈6〉1723 年 5 月 2 日。

编号：22

碑文：

耶稣会士汤公之墓

耶稣会士汤先生，讳尚贤，号宾斋（1），泰西罗搭零日呀因（2）人。缘慕洁修，弃家遗世，在会四十年（3）。于康熙三十九年庚辰（4），东来中华，传天主教。至雍正二年甲辰二月初二日（5），卒于顺天府，年五十六岁。

注释：

（1）原名 Pierre Vinecent de Tartre，在华期间与麦大成一起负责《皇舆全览图》山西、陕西、江西、广东、广西等图的测绘工作。亦研究《易经》。

（2）法兰西。生于 1669 年。

（3）1684 年入会。

（4）1700 年。曾在陕西传教。

（5）1724 年 2 月 25 日。



编号：23

碑文：

耶穌會士麥公碑



耶稣会士麦公之墓

麦先生讳有年，号积德（1），泰西傅尔都噶尔图（2）人也。自幼入会真修（3），于雍正四年（4）岁次丙午，入中国传教，在会二十年。于己酉年二月初六日（5），卒于京都，年三十六岁。

注释：

（1）原名 Paulo de Mesquita，事迹不详。

（2）葡萄牙。

（3）1709 年入会。

（4）1726 年。

（5）1729 年 3 月 5 日。

编号：24

碑文：

耶稣会士张公碑



耶稣会士张公之墓

张先生讳安多，号敦修〈1〉，系大西洋波耳都噶卫亚图〈2〉人。自幼入会〈3〉。于康熙四十四年〈4〉，入中华传教。于康熙六十年〈5〉，教命往西洋赠送礼物。于雍正四年〈6〉回京复命。卒于雍正十三年三月初一日〈7〉，享寿五十八岁，在会四十三年。

注释：

- 〈1〉原名 Antonio de Magalhaes，事迹不详。
- 〈2〉葡萄牙。
- 〈3〉1692 年入会。
- 〈4〉1705 年。
- 〈5〉1721 年。
- 〈6〉1726 年。
- 〈7〉1735 年 3 月 24 日。

编号：25

碑文：

耶穌會士嚴公碑



耶稣会士严公之墓

严先生讳嘉乐，号寃侯〈1〉，系大西洋波西米亚国〈2〉人。自幼真修〈3〉。于康熙五十五年〈4〉钦名进京，内廷供奉。卒于雍正十三年七月初七日〈5〉，享寿五十七岁，在会四十一年。

注释：

〈1〉原名 Karl Slavicek，来华后，为宫廷制造、修理钟表和风琴等。其名又作颜家乐、严家乐、燕嘉禄。

〈2〉波西米亚。

〈3〉1694年入会。

〈4〉1716年。

〈5〉1735年8月24日。

编号：26

碑文：

耶稣会士何公碑



耶稣会士何公之墓〈1〉

何先生讳天章，□〈2〉起文〈3〉，系澳门人。自幼入耶稣会〈4〉，传教四十五年。卒于乾隆元年四月初一日〈5〉，享年六十九岁，在会五十年。

注释：

〈1〉本墓地现存有十四块中国教士墓碑，事迹大多不详。

〈2〉此处拟为“号”。

〈3〉外文名 Francis Xavier a Rosario。

〈4〉1686年入会。

〈5〉1736年5月11日。

编号: 27

碑文:

耶稣会士苏公碑



耶稣会士苏公之墓

苏先生讳霖，号沛苍（1），系大西洋波耳都噶里亚国（2）人。自幼真修（3）。于康熙二十三年（4）岁庚甲子入中国。于康熙戊辰年（5）钦名进京，内廷供奉。卒于乾隆元年八月初十日（6），蒙钦赐常银二百两。在会六十年，享年八十一岁。（7）

注释：

（1）原名 Jose Suarez，清宫廷行走，曾被派往广东购买手枪和数学仪器。其在华时间长达五十二年，是栅栏墓地现存墓碑中位居第一者。

（2）葡萄牙。生于1656年2月15日。

（3）1673年入会，年仅十七。

（4）1684年。苏公1680年来中国，此处碑文有误。

（5）1688年。

（6）1736年9月14日。

（7）此碑碑阴有“圣母堂碑记”和零散残缺的汉满文字。1654年，清朝将利玛窦墓两傍土地赐与了汤若望，汤在此曾建圣母堂一座。至苏公去世，时隔八十余年，圣母堂已毁，估计该碑为旧物改用。

编号：28

碑文：

耶稣会士任公 之墓

任先生讳重道，号致远〈1〉，系大西洋意大利人。自幼真修〈3〉。于乾隆三年〈4〉岁次戊午进京传教，卒于乾隆四年十一月初七日〈5〉。在会二十一年，享年三十八岁。

注释：

〈1〉原名 Giacomo Antonini，珐琅专家。

〈2〉意大利。

〈3〉1718年入会。

〈4〉1738年。当年正月与天文学家傅作霖、画家张纯一、钟表专家席澄源一同进京。

〈5〉1739年12月7日。



编号：29

碑文：

耶稣会林公 之墓

林公伟济各，号雨
苍（1），系大西洋热尔
玛尼亚国（2）人。年二
十九岁入会（3），随耶
稣会士传教。于康熙四
十六年（4）入中国，进
京内廷供奉。于乾隆五
年三月十八日去世
（5）。蒙钦赐帝银貳百
两、大缎十端。在会五
十三年，享寿八十二
岁。

注释：

（1）原名 Franz
Stadlin，机械师，善做时
辰钟表。在华期间为宫廷
制造机械钟表和玩具达二
十二年之久，使清朝宫廷
制钟技术达到较高程度，
康熙认为“比西洋钟表强
远了”。

（2）日耳曼。今瑞士
人。

（3）1687 年入会。

（4）1707 年。已是年
近五旬之人。

（5）1740 年 4 月 14
日。



编号：30

碑文：

耶稣会士费公 之墓

费先生讳德，号存诚（1），泰西热尔玛尼亚（2）国人。自幼入会真修（3），于康熙四十九年（4）庚寅入中国传教。于康熙五十年（5）辛卯钦召进京，内廷供奉。卒于乾隆八年癸丑閏四月十二日（6），蒙钦赐帝银贰百两。在会五十五年，享寿七十岁。

注释：

（1）原名 Ehrenbert Xaver Fridelli，在华期间参加了《皇舆全览图》的喀尔喀蒙古、陕西、山西、四川、云南等地的测绘工作。1720年将北京东堂扩建成欧式教堂。

（2）日耳曼。今奥地利人。

（3）1688年入会。曾任北京耶稣会会长。

（4）1710年。

（5）1711年。

（6）1743年6月4日。



编号: 31

碑文:

耶稣会士吴公
之墓

吴先生讳直方,号
正文(1),泰西波尔都
噶尔亚国(2)人。自幼
入会真修(3)。乾隆九
年(4)甲子,传教至澳
门。乾隆十年五月十五
日(5),奉旨到京,拜
年十月初五日(6)弃
世。在会十年,享年二
十七岁。

注释:

(1) 原名 Bartolomeu
de Azevedo, 事迹不详。

(2) 葡萄牙。

(3) 1735 年入会。

(4) 1744 年。

(5) 1745 年 6 月 4
日。

(6) 1745 年 10 月 29
日。



编号：32

碑文：

耶稣会士高公之墓

高先生译嘉乐，号怀义（1），慕西波尔都噶尔亚国（2）人。自幼入会真修（3）。康熙三十五年（4）进广东，至北直真定府（5）传教。雍正二年（6）进京。卒于乾隆十一年正月十五日（7），年八十三岁，在会六十六年。

注释：

（1）原名 Carlis de Rezende，事迹不详。

（2）葡萄牙。

（3）1680 年入会。

（4）1696 年。

（5）明成祖以北平为北直隶，清设直隶省。真定府，又名正定府，今河北正定。

（6）1724 年。

（7）1746 年 2 月 5 日。



编号: 33

碑文:

耶稣会士戴公之墓

戴先生讳进贤，号嘉宾^①，泰西热尔玛尼亚国^②人。自幼入会真修^③，传教东来。康熙五十五年^④同奉旨进京，至康熙五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⑤奉上谕：“非通晓历法之人，不能细查微小增减，不觉渐错。戴进贤虽系新来，尚未全晓清汉语，其历法、算法上，学问甚□，为人亦沉重老实。着放纪理安^⑥员缺，欽此。”雍正三年三月二十日^⑦奉旨：“戴进贤治理历法，着改授监正加礼部^⑧侍郎銜^⑨，欽此。”乾隆十一年三月初九日^⑩去世，蒙赐帑银贰百两、大□^⑪十端，欽此。约计在会五十三年，管理监务二十九年，享寿六十有七。

注释:

① 原名 Lgnatius Koegler，学问广博，来华前曾任教员多年，擅长数学和天文学。在华期间，和清代数学家梅毂成、何国宗、明安图一同编纂《历象考成后编》、《仪象考成》等书，还费时十年，监制玑衡抚辰仪。这是清朝铸造的最后一件大型天文铜仪。其任职钦天监二十九年，介绍西洋天文新学说方面，南怀仁亦不如之。

② 日耳曼。今德国。1680年生。

③ 1696年入会。1738年任耶稣会中国省区副会长。

④ 1716年3月13日，戴进贤与十三位耶稣会士从葡都里斯本出发，同年8月



31日抵澳门。康熙五十五年底，即1717年1月2日奉旨进京，佐理历政。

〈5〉1720年1月8日。

〈6〉纪理安为耶稣会士，曾奉旨治理历法，此时因病不能工作。参见纪理安碑文。

〈7〉1725年5月2日。清初用西洋人于钦天监，名曰监修。雍正三年去监修名，实授监正。戴为西方传教士实授钦天监监正之第一人。

〈8〉礼部，掌礼仪、祭享、贡举等职之官属。

〈9〉侍郎，官名，正二品，与尚书同为各部堂官。给予侍郎衔，意即享受侍郎待遇。

〈10〉1746年3月30日。

〈11〉此处拟为“缎”。

编号：34

碑文：

耶稣会士罗公之墓

罗公讳怀忠，号子敬（1），泰西意大利亚国（2）人。冠时入会真修（3），随耶稣会士传教，康熙五十四年（4）间进京。精通外科，善调诸药。尚延行走，致力多年。兼之施药济人，兼手理诸各等疮毒，日日行之无少厌息，三十余年受恩者无算。乾隆十二年正月二十日（5）去世，蒙恩旨赐内帑银二百两，欽此。约计在会四十七年，享寿六十有八。

注释：

（1）原名 Giovanni de Costa，外科医生，在华行医施药，并多次奉召入宫行医。

（2）意大利。1680 年生于坎帕尼亚区，今那不勒斯城。

（3）1700 年入会。

（4）1715 年。

（5）1747 年 2 月 28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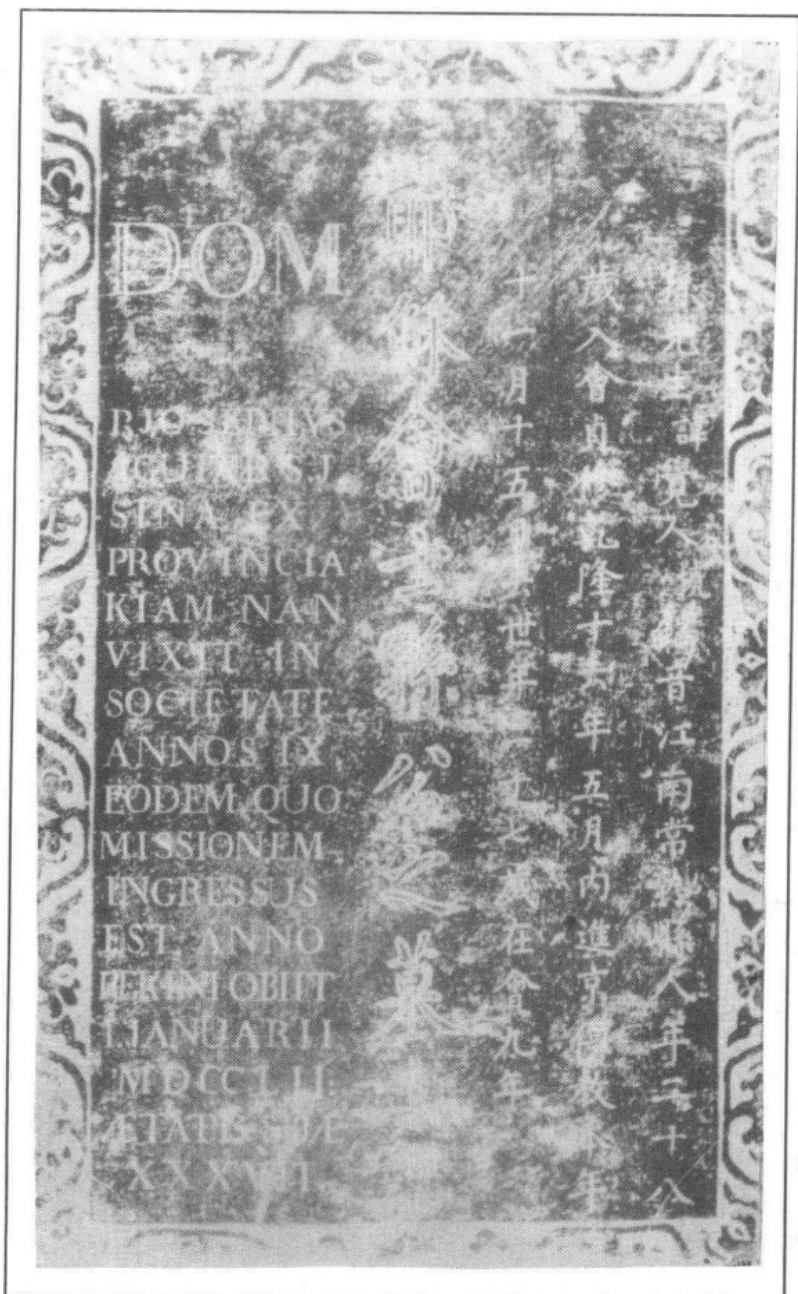


编号：35

碑文：

耶稣会士孙公之墓

孙先生讳觉人，号铎音〈1〉，江南常熟县人。年二十八岁入会，修〈2〉。乾隆十六年五月〈3〉内进京传教，本年十一月十五日〈4〉去世，年三十七岁，在会九年。



注释：

〈1〉外文名 Joseph de Aguiar，事迹不详。

• 〈2〉1743年入会。

〈3〉1751年6月。

〈4〉1752年1月1日。

编号: 36

碑文:

耶稣会士樊公之墓

樊先生讳守义，号利和 (1)，系山西绛州 (2) 人。卒于乾隆十八年正月廿六日 (3)，享年七十一岁，传教三十三年，在会四十四年。



注释：

〈1〉外文名 Louis Fan，1707 年二十六岁时随艾逊爵（Provana）同往欧洲，赴意大利求学，先后在罗马、米兰、都灵学习。1709 年入耶稣会，神学毕业后晋铎。又航海至里斯本，历时十几年始返中华。守义又作守利、守和、诗义。

〈2〉今山西省新绛县。在自著《身见录》自序中，称自己为平阳人。1682 年 6 月 13 日生。

〈3〉1753 年 2 月 28 日。

编号：37

碑文：

耶稣会许公之墓

许先生讳立正，号秉元^{（1）}，江南五河县^{（2）}人。于雍正十二年^{（3）}，入堂讲道。因其自幼未婚，宣力有年，仪表端方，恩准临终进会。于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4）}去世，享年六十三岁。

注释：

^{（1）}外文名 Ignatius Hiu，事迹不详。

^{（2）}今安徽五河县。

^{（3）}1734年。

^{（4）}1757年7月29日。



编号：38

碑文：

耶稣会士鲁公之墓

鲁先生讳仲贤，号□德〈1〉，泰西波赫米亚国〈2〉人。自幼进会员修〈3〉。于乾隆六年〈4〉岁次辛酉，传教至澳门。乾隆七年壬戌十月二十八日〈5〉奉旨进京。卒于乾隆二十四年己卯六月初二日〈6〉，在会三十年，寿五十有一。

注释：

〈1〉原名 Johann Walter，通乐律，能作词曲，善于配器。来华后曾为清廷创作歌曲以备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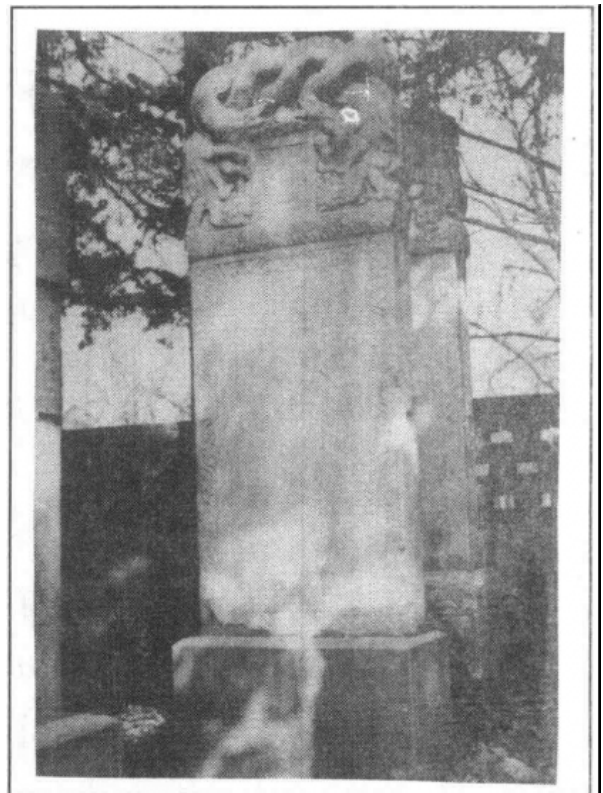
〈2〉波西米亚。今捷克西部地区旧称。

〈3〉1729年入会。

〈4〉1741年。

〈5〉1742年11月24日。壬戌为壬戌之误。

〈6〉1759年6月26日。



编号：39

碑文：

耶穌會修士利公之墓



编号: 40
碑文:

耶稣会修士罗公碑



耶稣会修士罗公之墓

罗先生[]启明，号曜东〈1〉，泰西玻尔都噶尔图〈2〉人。幼肄外科，弱冠入会〈3〉，持守谦恭，屢译神品，术业所便，甘就箱箒。乾隆十六年〈4〉，来京效用，志宣堂信，言行化人，施医[]药兼济，神形不知倦怠，积劳成瘵，功完谢世，洵为仁爱牺牲。在会一十八年，卒于乾隆二十九年十月一十九日〈5〉，享年三十九岁。

注释：

- 〈1〉原名 Manuel de Mattos，外科医生，曾以御医身分随同乾隆皇帝巡视各地。
- 〈2〉葡萄牙。
- 〈3〉1746年入会。
- 〈4〉1751年。
- 〈5〉1764年11月12日。

编号: 41
碑文:

耶稣会士郎公碑



耶稣会士郎公之墓

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初十日〈1〉奉旨：西洋人郎世宁〈2〉，自康熙年间〈3〉入值内廷〈4〉，颇著勤慎，曾赏给三品顶带。今患病溘逝〈5〉。念其行走年久，齿近八旬，著照戴进贤〈6〉之例，加恩给予侍郎衔，并赏内府〈7〉银三百两，料理丧事，以示优恤。欽此。

注释：

〈1〉 1766年7月16日。此谕发于郎世宁去世的当天。

〈2〉 原名 Giuseppe Castiglione，画家、建筑师。意大利米兰人，生于1688年7月19日。1707年在热那亚入会。世宁又作石宁、士宁。

〈3〉 1715年7月10日达澳门，12月22日与罗怀忠一同进京，1723年奉召入内廷供职。

〈4〉 宫禁以内。此处指宫廷画苑如意馆。郎世宁曾受过绘画训练，在欧洲已相当有名。他在如意馆任三品官，白天进宫作画，夜居东堂，效力达四十年之久，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其西洋画在皇宫内位居第一，深受乾隆喜爱。

〈5〉 卒于1766年7月16日，年七十八岁。

〈6〉 德国传教士。参见戴进贤碑文注释。

〈7〉 皇家仓库。

编号: 42

碑文:

耶稣会士沈公碑



耶稣会士沈公之墓

沈先生系云间娄邑〈1〉人氏，讳东行〈2〉。冠年矢志入会精修，积行数年，晋登神品〈3〉。迨其生平，凜遵长命，敏行慎言，其德其才实足为中修之巨擘也。至若炽情，爱主念切，同侪有加靡己，是以秉铎二十七年，历燕、辽、青、豫未遑宁息，口宣身率，竭尽忠诚，沾其化者，莫不踊跃恐后。今于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4〉，功全行满，主命宠临，享年五十有七。无教刺之微疾，顿断息于神策。

注释：

〈1〉云间为松江县之古称。汉代置娄邑，清属松江。今为上海市。生于1710年。

〈2〉外文名 Joseph Saraiva，事迹不详。

〈3〉1739年晋铎。

〈4〉1766年12月16日。

编号：43

碑文：

耶稣会士魏公 之墓

耶稣会士魏先生，译
继晋，号善修（1），麻西
尔玛尼亚国（2）人。大清
乾隆四年（3），来京传教。
忠爱舍己，抚恤教众，历三
十余载。种功为业，讲道为
务，以致圣教日衍。卒于乾
隆三十六年（4），在会四十
五年，值会九年，享寿六十
有六。

注释：

（1）原名 Florian Bahr，精
通乐律。在华期间曾任宫廷乐
师，与鲁仲贤合作乐曲、歌词。
还著有《德华词典》，收有二千
个单字。

（2）日耳曼。1706 年生于
德国，1726 年入会。曾任中国
耶稣会教务视察六年，日本耶
稣会教务视察九年。

（3）1739 年。1738 年已抵
澳门。

（4）1771 年。



编号：44

碑文：

耶稣会士鲍公碑



耶稣会士鲍公之墓

耶稣会士鲍先生，译友管，号义人〈1〉，泰西热尔玛尼亚国〈2〉人。自幼入会精修〈3〉。大清乾隆四年〈4〉，来京传教。乾隆十一年〈5〉，奉旨升授钦天监监副，历任二十六载。勤敏监务，敦实忠属，德业兼著。卒于乾隆三十六年〈6〉，享年七十有一。蒙恩旨赐内帑银二百两为安葬之资。

注释：

- 〈1〉原名 Anton Gogeisl，在华期间参加了《仪象考成》的编纂工作。
- 〈2〉日耳曼。今德国巴伐利亚人。
- 〈3〉1720年入会。
- 〈4〉1739年。
- 〈5〉1746年。
- 〈6〉1771年。

编号：45

碑文：

耶稣会侯公之墓

耶稣会侯若翰〈1〉，系北京〈2〉人氏，讳钰，号已修。鲁习拉丁书已准入肄修德之业。因染痲疾之症，临终时，恩准许愿，在会终身修道矣。终于乾隆三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3〉，年二十九岁。

注释：

〈1〉外文名 John Hou，事迹不详。

〈2〉都城北京。

〈3〉1773年2月12日。



编号: 46

碑文:

耶稣会士刘公 之墓

耶稣会士刘先生，讳松龄，号乔年^①，泰西热尔玛尼亚国^②人。自幼入会精修^③。大清乾隆四年^④，来京传教。乾隆八年^⑤，奉旨升授钦天监监副；乾隆十一年^⑥，特授监正；乾隆十八年^⑦，因接送波尔都噶里亚国^⑧使臣有功，赏给三品职衔食俸。共在监三十一载，勤敏监务，教实慈属，德业兼著。卒于乾隆三十九年^⑨，享年七十有二。蒙恩旨赐内库银二百两为安葬之资。

注释:

①原名 Augustin von Hallerstein，擅长数学和天文，亦精地理舆图之学，在钦天监行走达三十二年。

②1903 年生于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过去多认为其是奥地利或日耳曼人。

③1721 年入会。

④1739 年进京。1738 年途经葡萄牙入华。

⑤1743 年。

⑥1746 年。

⑦1753 年。



- 〈8〉 葡萄牙。葡使臣巴哲哥来华一年，刘为钦差迎送使臣，两度赴广东。
- 〈9〉 1774年9月25日。

编号: 47

碑文:

耶穌聖家會士黃公碑



D. O. M.
 PHILIP MAR
 HOANG PEKIN
 ALUMNUS COL
 LEGII NEAPOLI
 CENOUOPOST
 XXIV ANS STU
 DIUM RE MISS
 AD SINAS PER
 ANNOS MISS
 FECTIONE UBI
 TAFTHISM
 CONTRAXIT
 EQPEKINURE
 VERSUS PER II
 AN VALETUDI
 NEM CURAVIT
 DIES VERODEF
 CIENT VIRITAN
 DEMOBIT XXIX
 APR. A. D. MDCCL
 XXVI ET LXV

耶穌聖家會士黃公之墓

黃公名... 二十四年... 聖家會士... 黃公之墓... 光緒四十二年三月初九日... 六十五歲

耶稣圣家会〈1〉士黄公之墓

黄先生讳之汉，圣名斐理伯〈2〉，都城〈3〉人。自幼立志精修〈4〉，在会院三十四年，专务超性学文〈5〉，后来领教宗圣命，于乾隆二十八年〈6〉，教教他乡十有一载。因劳力身衰，回京养疾二载后，终于乾隆四十一年三月初九日〈7〉，享寿六十五岁。

注释：

- 〈1〉 该会情况待考。
- 〈2〉 外文名 Philip Maria Huang，事迹不详。
- 〈3〉 都城北京。
- 〈4〉 1742 年入会。
- 〈5〉 指神学理论。
- 〈6〉 1763 年。
- 〈7〉 1776 年 4 月 26 日。

编号：48

碑文：

修士陈公之墓

陈先生讳重修，字寄耘（1），系广东顺德县人，享寿六十有四。自幼入耶稣会，传教三十余年，几历艰毒。与人克忍克让，律已（2）守约甘贫，所谓“自修之良士，爱众之惠人”。卒于乾隆四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3）。谨泐碑以志之。



注释：

（1）外文名 Jean - Francois Xavier，事迹不详。

（2）已拟为已之误。

（3）1776年8月7日。

编号：49

碑文：

耶稣会士艾公之墓

司铎艾公讳启蒙，号曜庵〈1〉，系波西米亚〈2〉国人。生于康熙四十七年〈3〉。壮时矢志捐修，乾隆元年〈4〉入耶稣会□□于乾隆十年〈5〉奉旨进京。在如意馆效力多年，甚合上意。是以屡领特宠，频赐厚惠，即授以奉宸苑〈6〉卿，三品职衔食俸。于乾隆四十二年〈7〉叨蒙恩赏七旬盛典，兼赐御书“陈图省缺”匾额。至于德行之称，难以悉举，而坚忍之称，尤为特著。卒于乾隆四十五年九月重阳日〈8〉，享年七十有三。既卒□□钦赐内帑银二百两，以为殓葬之资焉。

注释：

〈1〉原名 Ignaz Sichelbarth，画家。与郎世宁等人同在如意馆供职，其画学方面受教于郎世宁，功力不下于其师，亦善马。

〈2〉今译波西米亚，是捷克西区的旧称。

〈3〉170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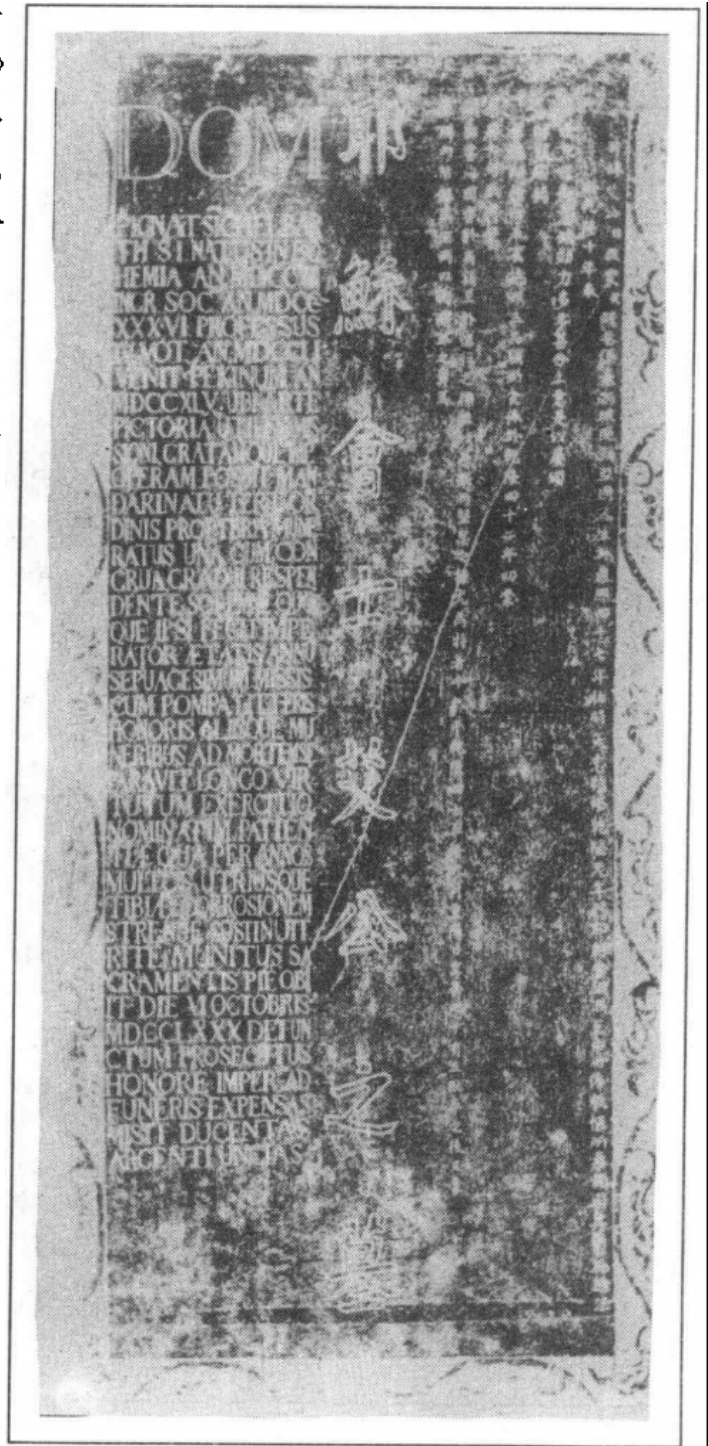
〈4〉1736年入会，1750年晋铎。

〈5〉1745年。

〈6〉主管皇家园囿的官署名，属内务府。主管者称奉宸苑卿。

〈7〉1777年。

〈8〉1780年10月6日。



编号：50

碑文：

耶稣会士傅公 之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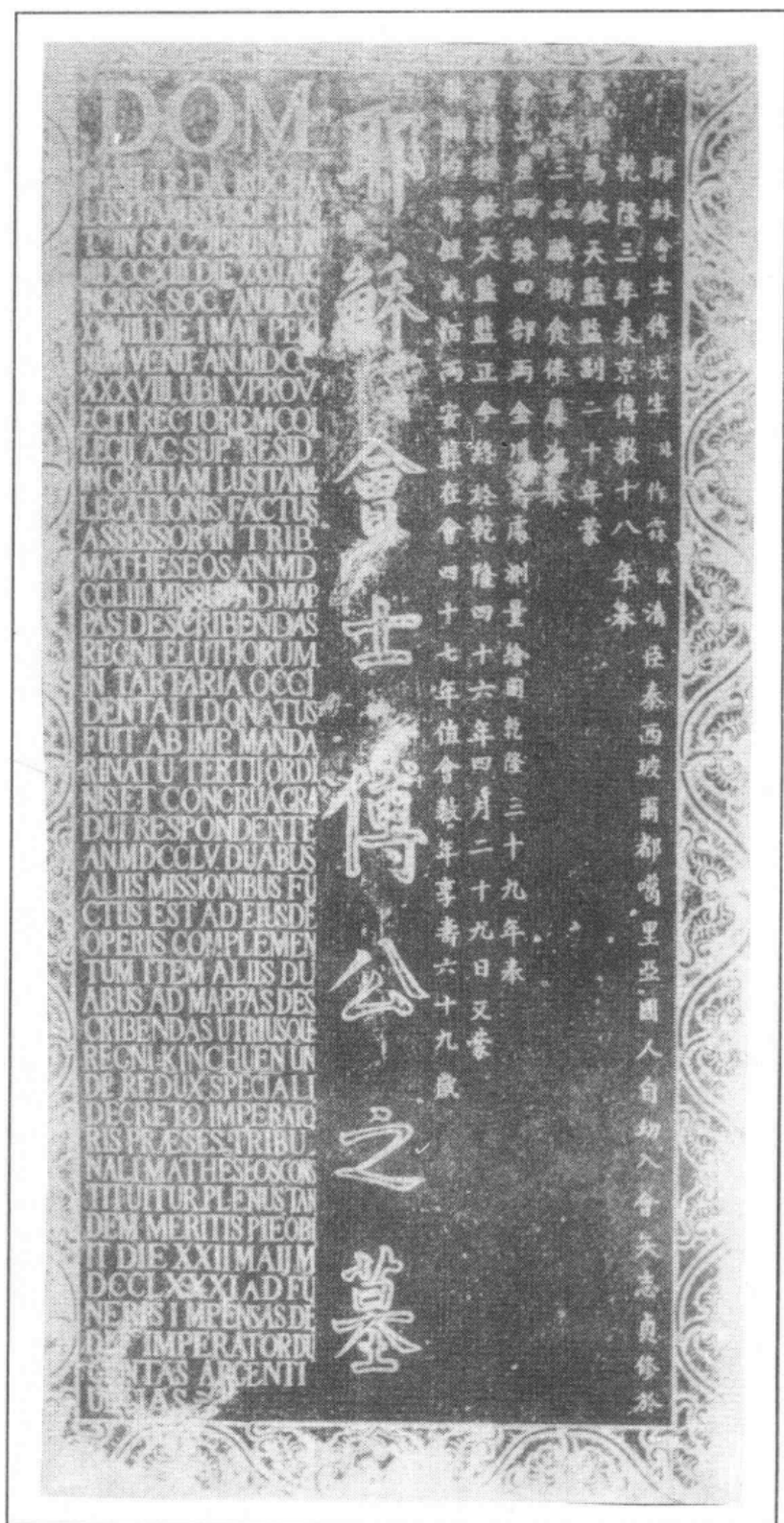
耶稣会士傅先生，译作霖，号清臣^{（1）}，泰西波
尔都噶里亚国^{（2）}人。自
幼入会^{（3）}，矢志贞修。于
乾隆三年^{（4）}来京传教，十
八年^{（5）}奉旨授为钦天监
副。二十年^{（6）}蒙恩加三
品职衔食俸。屢次奉命出
差西路回部、两金川等处
测量绘图。乾隆三十九年^{（7）}
奉旨，特授钦天监正。
今终于乾隆四十六年
四月二十九日^{（8）}，又蒙
赐内帑银二百两安葬。在
会四十七年，值会数年，享
寿六十九岁。

注释：

（1）原名 Felix da Rocha，
在华期间参与了《乾隆内府铜
版地图》的绘制工作。该图北
抵北冰洋，南至印度洋，西及
波罗地海、地中海和红海，是
一幅极为完善的亚洲大陆全
图。参与《仪象考成》的修纂，
戴进贤卒后，负责最后几册的
工作。

（2）葡萄牙。

（3）1734 年入会。



- (1) 1738 年来京
- (5) 1753 年。
- (6) 1755 年。
- (7) 1774 年。
- (8) 1781 年 3 月 22 日。

编号：51

碑文：

耶稣会士林公 之墓

耶稣会修士林，讳德
瑄，号洁修（1），系路西大
尼亚国京都（2）人。年七
十有五，在会四十八年
（3）。同本国巴大人来京
（4），殷勤传教，历□勿衰。
命安逝于乾隆四十九年十
二月十二日（5）。

注释：

（1）原名 Joao de Seixas，
天文学家。

（2）葡萄牙里斯本。

（3）1736 年入会。

（4）1752 年 8 月，葡新任
国王若瑟，特遣使臣巴哲哥来
华，林为使团十三名随员之一，
后留在中国。

（5）1785 年 1 月 22 日。



编号：52

碑文：

耶稣会士艾公 之墓

艾若翰〈1〉系江西人，耶稣会司铎〈2〉，生于康熙五十五年〈3〉。传教多处，为天主历尽艰辛。于乾隆五十年正月〈4〉，在苦中艰忍而卒，时年七十一岁。

注释：

〈1〉外文名 John Simonelli，事迹不详。

〈2〉天主教神父的正式品位职称。通常负责一个教堂的工作，协助主教管理教务，遵称“神父”。中国天主教最初将拉丁文 sacerdotes（神父）音译为“撒责尔铎德”，简称“铎德”或“撒责”，后根据儒家“司政教时振木铎”之说，改称司铎。

〈3〉1716年。

〈4〉1785年2—3月间。



编号：53

碑文：

圣方济各会士
叶公之墓

圣方济各会修士欧瑟彼阿叶，译宗考，号承先（1），系物诺西亚（2）国人。原乃信德部（3）所遣译德。来京传教二十余年，诚博学仁慈之士。后因信德部断其供给，遂移居南堂（4），约有二□。今于乾隆五十年三月十四日（5）安逝，寿六十有九。

注释：

（1）原名 Eusebio a Cittadella，事迹不详。

（2）意大利。

（3）罗马教廷管理传教事务的机构。

（4）北京宣武门天主教堂。

（5）1785年4月22日。



编号：54

碑文：

圣若翰保弟斯大会
士哆囉公之墓

圣若翰保弟斯大会 (1)
士哆囉先生，原名方济各若
瑟 (2)，泰西意大利亚国
(3) 人。于乾隆四十六年
(4) 东来中华，住居在广东广
州府，为罗马府 (5) 当家，办
理圣教事务，及传信德文部
(6) 事件。于乾隆五十年三月
二十一日 (7)，在京师为办理
传教要务，卒于刑部 (8)，现
年五十四岁。

注释：

(1) 该会情况待考。

(2) 原名 Giuseppe Frances
co della Torre，事迹不详。

(3) 意大利。

(4) 1781 年。

(5) 即罗马教廷。

(6) 即信德部，又译传信部。

(7) 1785 年 4 月 29 日。

(8) 官署名，掌管法律和刑
狱事务。



编号：55

碑文：

耶稣会士高公 之墓

泰西修士玻尔都亚因〈1〉人，高讳慎思〈2〉。幼而入会〈3〉，矢志修道。及所学既博，大业已成，即于乾隆十六年〈4〉进京。二十年〈5〉、二十四年〈6〉两次派往伊犁绘图。恩赏四品顶戴。三十六年〈7〉任钦天监监副，四十五年〈8〉升授监正。天文历数亦皆熟谙，且值会多年，统率众士。今卒于五十三年六月初六日〈9〉，年六十有六。蒙恩发内帑银二百两安葬，谨勒石以志之。

注释：

〈1〉 葡萄牙。

〈2〉 原名 Jose d'Espinha，在华期间参加了《乾隆内府铜版地图》西北地区的测绘和天文书籍编纂等工作。在宫廷行走三十余年。

〈3〉 1739年入会。

〈4〉 175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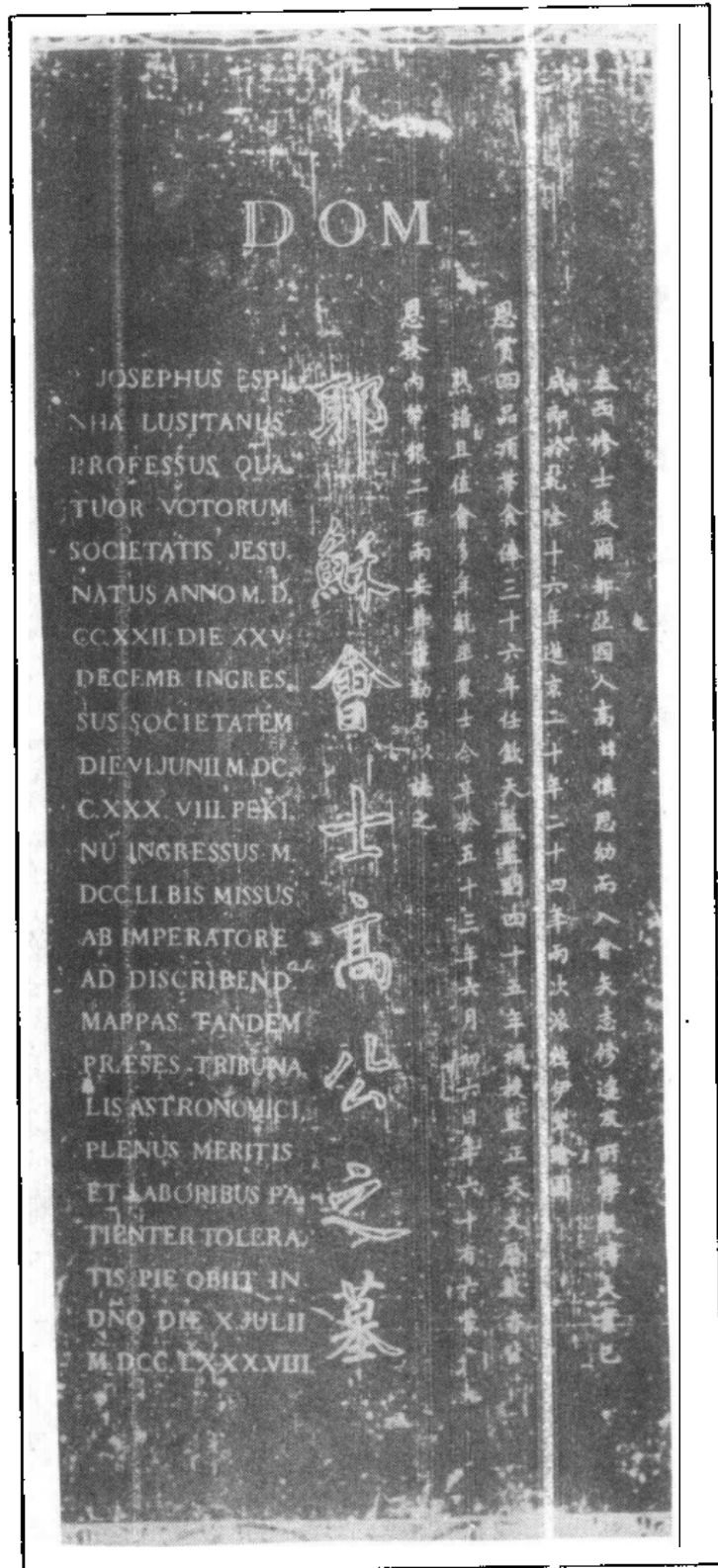
〈5〉 1755年。

〈6〉 1759年。

〈7〉 1771年。

〈8〉 1780年。

〈9〉 1788年7月9日。



编号：56

碑文：

圣方济各会士
伊公之墓

伊克肋森细亚诺〈1〉系意大利
里亚图〈2〉人，圣方济各会修士。
乾隆四十八年〈3〉，入中国传教，
至四十九年〈4〉为天主受多苦，
同九月始脱。在南堂赞襄教务，
明著热爱，大彰善举。于五十六
年十一月二十九日〈5〉病殁，年
四十七岁。约什其时正比阿第六
位教皇定为格洛日府主教。

注释：

〈1〉原名 Crescenzo Cavalli，事
迹不详。

〈2〉意大利。

〈3〉1783年。

〈4〉1784年。

〈5〉1791年12月24日。



编号：57

碑文：

耶稣会士张公之墓

司铎像纳爵雅（1），波尔都亚国（2）人，生于雍正三年八月十四日（3）。年十八岁入会（4）精修，于乾隆十七年（5），同本团钦差来京入觐。后传教四十余年，德各功全，安逝于乾隆五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6）。

注释：

（1）原名 Inacio Francisco，事迹不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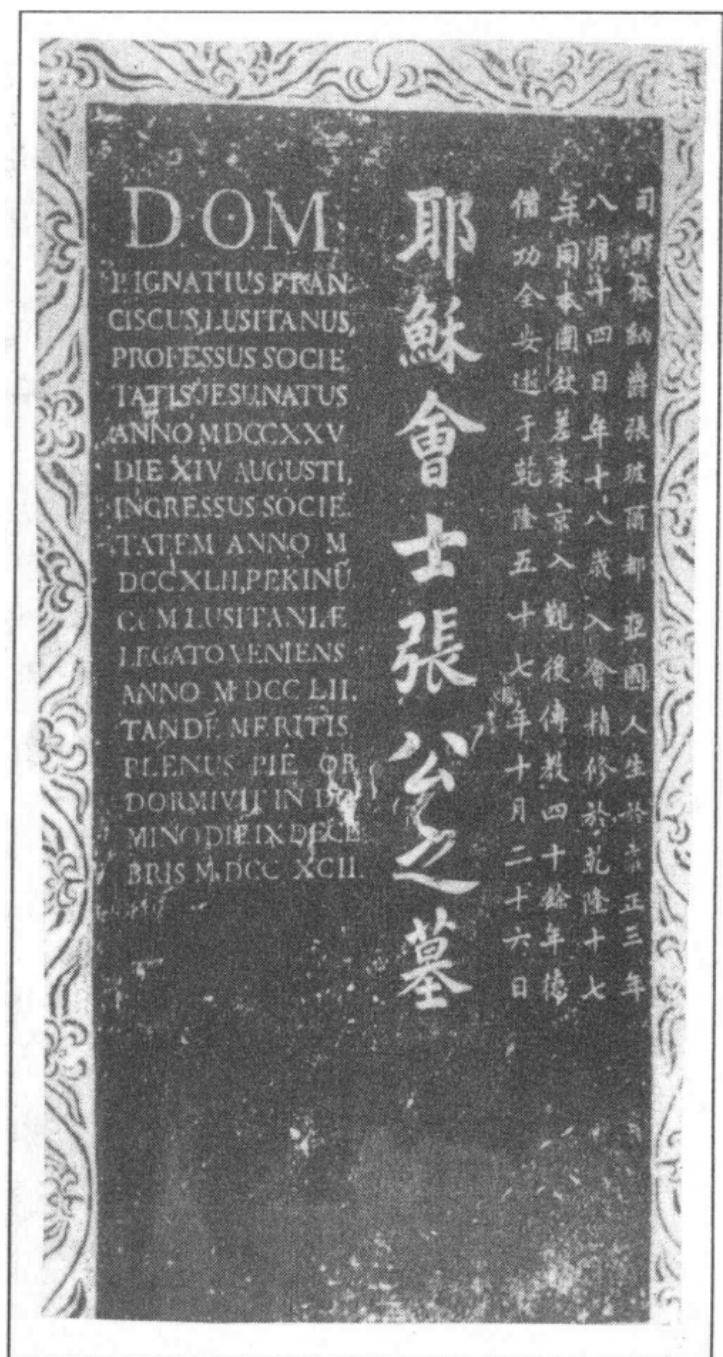
（2）葡萄牙。

（3）1725年9月20日。

（4）1743年入会。

（5）1752年。

（6）1792年12月9日，时年六十七岁。



编号：58

碑文：

司铎吴公之墓

吴若翰（1）系澳门人，生于乾隆二十九年（2），至四十九年（3）来京，嗣于五十二年（4）补升司铎，传教有年，不辍况瘁。于五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5）全领重事，平安卒世，时年三十岁。

注释：

（1）外文名 John a Remediis, 事迹不详。所属教会不明。

（2）1764年。

（3）1784年。

（4）1787年。

（5）1793年7月6日。



编号: 59

碑文:

耶稣会修士崔公碑



耶稣会修士崔公之墓

司铎保禄崔〈1〉，系山西潞安府〈2〉人，幼入耶稣会。至修业已成，传宣圣教四十一载，年至七十。于乾隆六十年十月二十四日〈3〉，安然长逝。

注释：

〈1〉 外文名 Paul Soeiro，事迹不详。

〈2〉 今山西省长治县。

〈3〉 1795年12月4日。

编号: 60

碑文:

司铎傅公碑



司铎傅公之墓

司铎傅安多尼〈1〉，系松江府南汇县〈2〉人。于乾隆五十三年〈3〉到京修道，嘉庆元年〈4〉升受撤责之位，年四十七岁。今于四年九月初八日〈5〉长逝。

注释：

〈1〉外文名 Anthony Duarte，事迹不详。所属教会待考。

〈2〉今上海南汇区。

〈3〉1788年。

〈4〉1796年。

〈5〉1799年10月6日。

编号：61

碑文：

司铎李公之墓

司铎李保禄(1)，系山西太原府太原县人。于乾隆五十年(2)到京修道，至五十七年(3)升受撒贵之位。今于嘉庆七年十二月初一日(4)长逝，年四十二岁。

注释：

(1) 外文名 Paul of the Cross，事迹不详。所属教会待考。

(2) 1785年。

(3) 1792年晋铎。

(4) 1802年12月25日。



编号: 62

碑文:

味增爵会修士 福公之墓

味增爵会(1)修士福多明我(2), 系大西洋博尔都亚国(3)人, 号文高。于嘉庆六年(4)奉旨递索致力, 本年十一月十四日(5), 蒙恩被钦天监右堂。至十年十二月初五(6)迁升左堂。十三年六月二十二(7), 转移正堂, 兼理算学馆。道光三年四月十五(8), 因病致仕, 四年正月初二(9)寿终, 享年七十有六。蒙恩赏内帑银壹百两为堂葬之资, 殓物石以志。(10)

注释:

(1)天主教修会之一。因第一座会院建立在巴黎辣匝禄教堂而称辣匝禄会; 因创始人为味增爵, 故而又称味增爵会; 因以派遣会上到农村向农民传教为宗旨, 又有“遣使会”之称。1773年罗马教皇正式下令取缔耶稣会。1783年, 味增爵会接管了在中国开办的教区。

(2)原名 Dominic Jo-



achim Ferreyra, 事迹不详。

〈3〉 葡萄牙。

〈4〉 1801 年。

〈5〉 12 月 19 日。

〈6〉 1806 年 1 月 24 日。

〈7〉 1808 年 8 月 13 日。

〈8〉 1823 年 5 月 25 日。

〈9〉 1824 年 2 月 1 日。

〈10〉 这是本墓地中唯一的味增爵会士墓碑，也是现存年代最晚的一块外国传教士墓碑。

编号：63

碑文：

李司铎保禄之墓

李神父名保禄（1），系顺天府宝坻县（2）人。出生于故世后一千八百六十年，光绪十二年（3）升铎德品位，传教于保定府（4）等处。最于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5），因病安逝于滕公柵栏，享年三十有六。（6）

注释：

（1）外文名 Paul Ly，事迹不详。从碑额判断，当为基督会成员。这是本墓地中唯一现存的基督会士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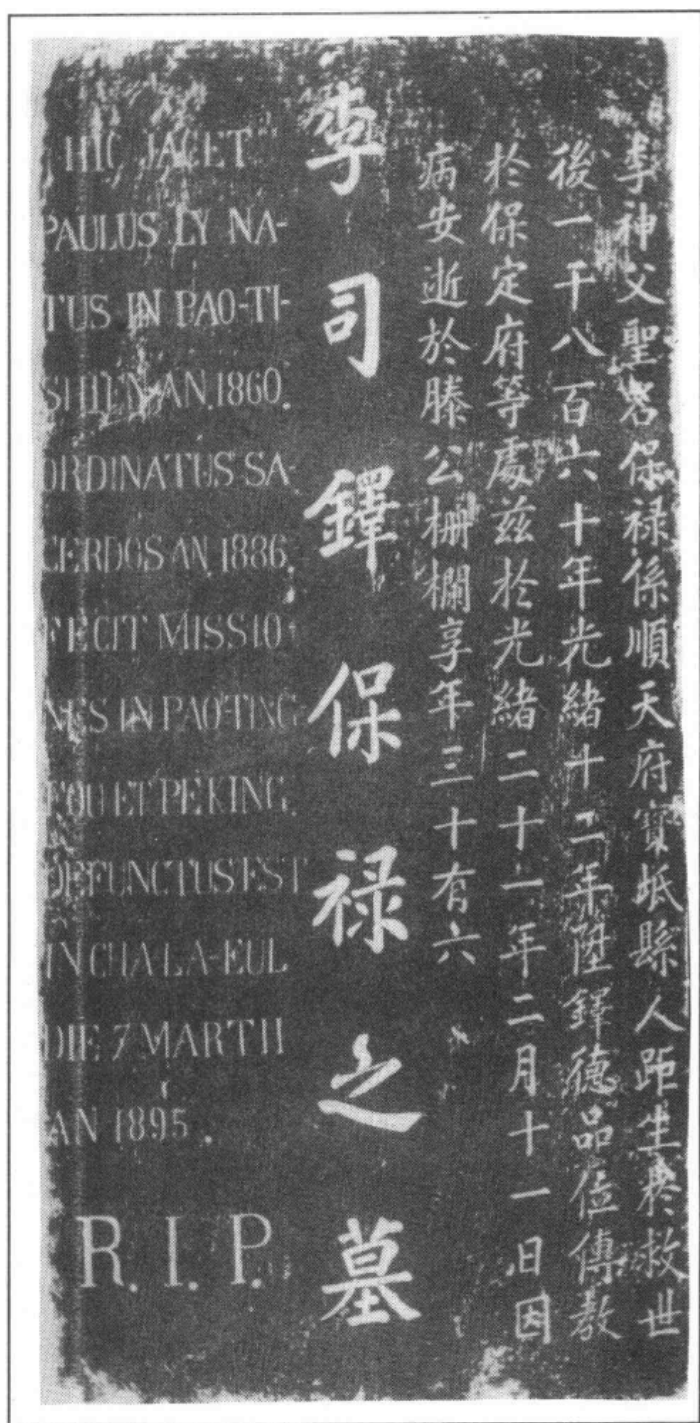
（2）今天津市宝坻县。

（3）1886年。

（4）今河北省保定市。

（5）1895年3月7日。

（6）这是墓地现存年代最晚的一块墓碑。



栅栏墓地碑文资料录

编号: 01

碑文:

耶稣会士龙公碑



耶稣会士龙公之墓

龙先生讳华民，号精华〈1〉，系泰西西济利亚〈2〉人。生于一千五百五十九年〈3〉，自幼入会真修〈4〉。万历丁酉年〈5〉航海东来，宣传垂教。利马窦〈6〉去世后，升为管理中国耶稣会务上司，曾严禁奉教信友崇奉中国礼典。卒于一千六百五十四年庚十二月十一日〈7〉，享寿九十有五。

按此墓原有碑志，庚子夏被□□劫毁。兹于光绪三十二年丙午〈8〉重立。

注释：

〈1〉原名 Nicolas Longobardi。在华时间长达五十八年，继利玛窦为中国耶稣会会长，影响很大。

〈2〉意大利西西里岛。出生于贵族家庭。

〈3〉生年还有 1556 年和 1565 年二说。

〈4〉1582 年入会。

〈5〉1597 年。

〈6〉即利玛窦。

〈7〉清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三。当时，清顺治帝赐银三百两并遣官祭奠。

〈8〉1906 年。

编号：02

碑文：

多明我会士郭公之墓

郭先生讳多明我，号西达〈1〉，大西洋倭西巴尼亚国〈2〉人也。自幼入多明我会〈3〉真修。清朝初航海东来中国行教〈4〉，康熙元年甲辰〈5〉卒于京师。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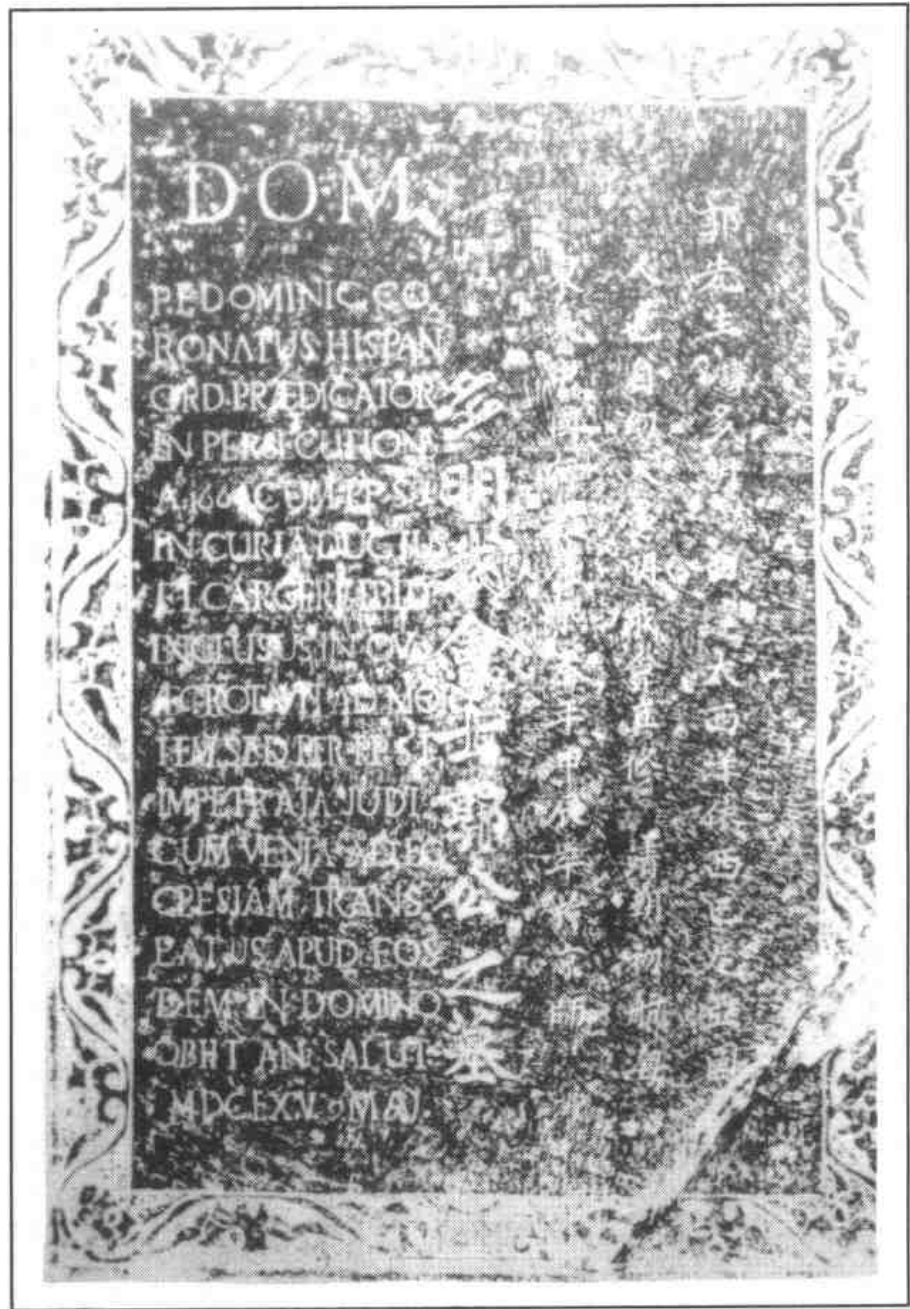
〈1〉原名 Dominique Coronatus。事迹不详。

〈2〉国籍不详。

〈3〉Dominican Order, 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 亦译为多米尼克派。该会注重布道活动, 传播经院哲学, 在欧洲许多大学都有其会士任教。郭公所在教会又有方济各会之说。

〈4〉具体时间待考。

〈5〉1664年。



编号：03

碑文：

耶稣会士郑公之墓

郑先生諱瑪諾，号惟信（1），中国广东香山人也。自幼入会真修（2），康熙十二年癸丑四月十一日（3）卒于京師，寿三十有八。

注释：

（1）外文名 Emmanuel De Sequeira。耶稣会第一位中国籍司铎。



〈2〉 1645年12月20日，年仅十三岁起程赴欧，五年后达罗马。1651年进罗马耶稣会圣安德勒初学院，1653年入罗马公学，1657年在该校教拉丁语和希腊语语法，1660年离罗马。1666年4月13日从里斯本东返回国，1668年8月19日到达澳门。1671年9月8日北上，因病至次年春夏方进京。

〈3〉 1673年5月26日。

编号：04

碑文：

耶稣会士徐公之墓

上諭“朕念徐日升斋穢〈1〉，远来致力岁久，渊通律历，制造咸宜，扈从惟勤，任使尽职，秉性贞朴无间，始终夙夜殫心，忠悃日著，朕嘉许久矣。忽闻抱病，犹望医瘳瘳可。遽尔遽逝，朕怀深为轸惻。特赐银二百两，大缎十端，以示优恤。远臣之意。特諭。”

徐先生讳日升，号寅公，泰西波耳多阿里亚国〈2〉人，自幼入会真修〈3〉，于康熙十二年〈4〉岁次癸丑入中国传教。卒于康熙四十七年岁次戊子十一月十四日〈5〉，寿六十四岁，在会四十六年。

注释：

〈1〉原名 Thomas Pereyra。精于音乐，供职钦天监，曾和传教士张诚一起参与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

〈2〉葡萄牙，生于1645年。

〈3〉1663年。1691年任耶稣会教务总视察，1706年任耶稣会中国省区副会长。

〈4〉1673年。1666年离欧，经印度果阿，1672年抵澳门。

〈5〉1708年12月25日。



编号: 05

碑文:

耶稣会士闵公之墓

闵先生讳明我，号德先〈1〉，泰西依大里亚国〈2〉人。自幼入会真修〈3〉，于康熙十年〈4〉岁次辛亥入中国传教。卒于康熙五十一年岁次壬辰十月十二日〈5〉，寿七十三岁，在会五十四年。

注释:

〈1〉原名 Philippus Maria Grimaldi. 1669 年来华后, 协助被拘禁的多明我会会长 Fernandz Navarratte (华名闵明我) 越狱, 潜逃至澳门, 而后顶替其名, 留在中国。后以精于历法被南怀仁推荐进京, 在钦天监行走。曾代表清帝赴俄与彼得帝会商交涉事宜。

〈2〉意大利。生于 1639 年。

〈3〉1657 年入会。1695 年 5 月 29 日任耶稣会中国省区副会长, 1700 年任北京会院院长, 1707 年任中国和日本教务视察。

〈4〉1671 年。1669 年来华。

〈5〉1712 年 11 月 10 日。有卒于 8 日说。



编号: 06

碑文:

耶稣会士杨公碑



耶稣会士杨公之墓

杨先生讳秉义，号履方〈1〉，泰西波尼维亚国〈2〉人也。自幼入会真修，于康熙四十九年〈3〉岁庚寅入中国传教，丙申四月〈4〉随驾热河，七月念三日〈5〉卒于口外，年四十六岁。

注释：

〈1〉原名 Francois Tillisch。事迹不详。

〈2〉奥地利。生于 1667 年。

〈3〉1710 年。

〈4〉1716 年 5—6 月间。

〈5〉9 月 8 日。

编号: 07

碑文:

十字会士夏公碑



十字会〈1〉士夏公之墓

夏先生讳真多，号本元〈2〉，泰西依大里亚国〈3〉人。自幼入会真修〈4〉，于雍正五年丙午〈5〉入中国传教。卒于乾隆元年己卯五月十八日〈6〉，在会二十五年，享年四十三岁。

注释：

〈1〉“十字会”所指不明。元代对基督教有“十字教”之称，“十字会”或由此而来。

〈2〉原名 Hgacintvs Tordanvs。事迹不详。

〈3〉意大利。生于1693年。

〈4〉1711年入会。

〈5〉此处碑文有误。雍正五年是丁未年，为1727年，丙午年为1726年。

〈6〉此处碑文有误。乾隆元年五月十八日是1736年6月26日，干支为“丙辰”，“己卯”既非该年干支，又非这天的干支。

编号: 08

碑文:

耶稣会修士徐公碑



耶稣会修士徐公之墓

徐先生讳懋德，号卓贤〈1〉，泰西玻尔都噶尔国〈2〉人。童年入会〈3〉，立志贞坚。时值康熙五十五年〈4〉亲来粤东，圣教广传一十四载，终日兢兢。雍正甲辰〈5〉奉旨传宣，授职监副，管理钦天内外诸事，独著精专，国会善士颂声万千。天主命至功完德全，乾隆癸亥〈6〉遂善终焉。帝赉二百，皇恩无边。计在会中三十六年，五十四岁，享寿绵绵。勒诸贞石，荣光常悬。

注释：

〈1〉原名 Andreas Pereira。长于历算，在钦天监佐助戴进贤编著天文书籍，任职近二十年。

〈2〉葡萄牙。生于1690年。

〈3〉1707年十七岁入会。1732—1738年任耶稣会中国省区会长。

〈4〉1716年。

〈5〉1724年。

〈6〉1743年12月2日。

编号：09

碑文：

圣奥斯定会士张公之墓

张先生讳中一，号礼元（1），泰西依大里亚国（2）人。自幼入□真修，于乾隆二年丁巳（3）入中国传教，于乾隆三年戊午年（4）钦召进京，内廷供奉。卒于乾隆七年壬戌六月初□□（5）。在会三十四年，享年五十岁。



注释：

〈1〉原名 Sera Fin-
vsa。入清宫任职情况待
考。

〈2〉意大利。

〈3〉1737年。丁巳
为丁巳之误。

〈4〉1738年。

〈5〉1742年7月
初。壬戌为壬戌之误。

编号：10

碑文：

圣末瞻爵会士德公碑



圣末瞻爵会士德公之墓

德先生伟理格，号性涵（1），泰西依大里亚国（2）人。自幼入会真修。于康熙四十九年（3）庚寅入中国传教，于康熙五十年（4）辛卯钦召进京，内廷供奉。卒于乾隆十一年丙寅十一月十四日（5），蒙□赐常银□百两。在会五十八年。享寿七十七岁。

注释：

- 1) 原名 Teodoricus Pedrinco。入清宫任职情况待考。
- 2) 意大利。
- 3) 1710年。
- 4) 1711年。
- 5) 1716年12月25日。

耶稣会士马公之墓

马先生讳德昭，号钦明〈1〉，泰西玻尔都噶尔亚国〈2〉人。自幼入会〈3〉真修，乾隆八年〈4〉岁次癸亥传教至澳门。乾隆九年三月初十日〈5〉，奉旨到京。于乾隆十六年岁次辛未年五月二十五日〈6〉去世。在会二十六年，享年四十六岁。

注释：

〈1〉原名 Antoine Gomez。事迹不详。

〈2〉葡萄牙。

〈3〉1725年。

〈4〉1743年。

〈5〉1744年4月22日。

〈6〉1751年6月18日。

编号: 12

碑文:

耶稣会士主教索公之墓

索老先生讳智能，号睿公^①，慕西波尔都噶尔图^②人。康熙身卯年^③进会，雍正丙午年^④西国使臣^⑤抵澳。雍正戊申年^⑥传教江南，已酉年^⑦遵旨来京。勤业精修，副理教务者十有三载。乾隆庚申年^⑧选授主教，癸酉年^⑨领受神秩，兼辖都门者先后又一十六载。幸修厥职，德范群愚，拯济神形，始终不倦。洵哉贫窶，恬静久矣，群灵善牧。乾隆丁丑年^⑩寿登六秩，功成安逝。

注释:

- (1) 原名 Polycarpus de Sousa。事迹不详。
- (2) 葡萄牙。生于 1697 年 1 月。
- (3) 1711 年。
- (4) 1726 年。
- (5) 指葡国特使麦得乐 (Souza e Menezes)。
- (6) 1728 年。
- (7) 1729 年，已酉为已酉之误。
- (8) 1740 年。
- (9) 1753 年。
- (10) 1757 年 5 月。



编号: 13

碑文:

耶稣会修士索公之墓

耶稣会修士索若瑟 (1), 系大西洋博尔都亚国 (2) 人, 讳德捷。越常生于天主降生后一千七百二十八年, 至一千七百四十六年始, 入会精修, 陶冶既成。乾隆



隆□□□年来皆进索, 致力宣教, 至四十六年 (3) 蒙恩授钦天监监副, 五十八年 (4) □蒙恩赏三品职銜, 六十年 (5) 转授监正, 兼理算学馆, 计司监务事业凡二十有五载。命于嘉庆十年九月二十有二日 (6) 寿终, 享年七十有八岁。蒙恩赐内帑银一百五十两, 为茔葬之资。谨砌石以志之。

注释:

(1) 原名 Josephus Bernardus de Almeida。1759 年 5 月来华。约于次年进京, 曾奉命创办历算学馆, 因贵族子弟惮于研究而停办。

(2) 葡萄牙。

(3) 1781 年。

(4) 1793 年。

(5) 1795 年。

(6) 1805 年 11 月 12 日。

编号：14

碑文：

圣方济各会修士汤士选之墓

大西洋修士汤亚豆山，修士选（1），係博尔都亚国（2）人。生于天主降生后一千七百五十一年。至一千七百六十九年入会精修，由司铎涌堂主教，于乾隆五十年（3）奉旨进京，专理天文，授职钦天监监副，擢升监正，兼管园子监算学，历官凡二十载。卒于嘉庆十三年閏五月十三日，寿五十七岁。蒙赐内帑银壹百伍拾两，安葬于此，誌石。

注释：

（1）原名 Alexander Gouvea。方济各会会士在清钦天监任职较长时间者，当属此公。

（2）葡萄牙。

（3）178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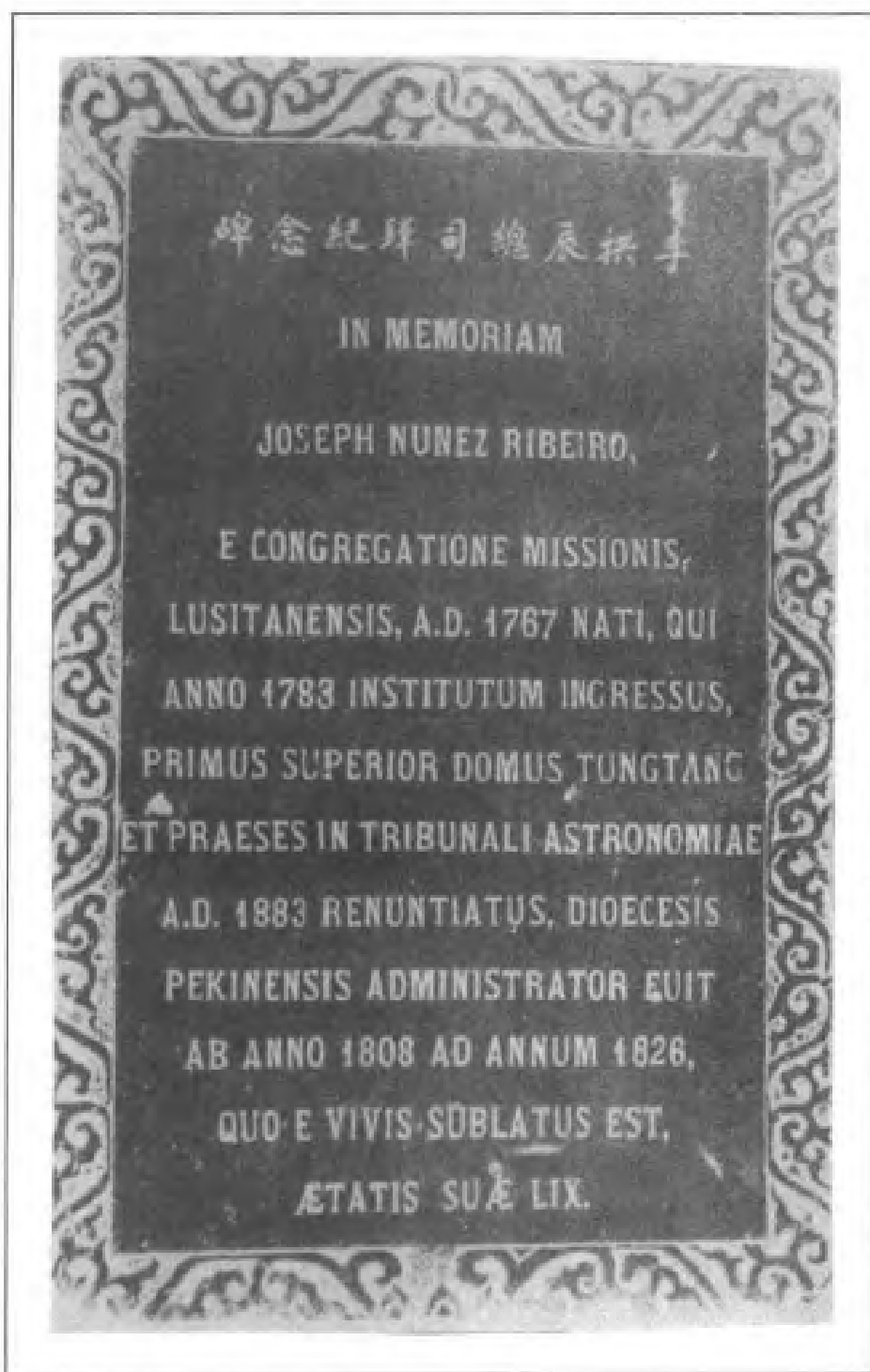
（4）1808年7月6日。



编号：15

碑文：

李拱辰总司铎纪念碑



李拱辰总司铎纪念碑

IN MEMORIAM
JOSEPH NUNEZ RIBEIRO,
E CONGREGATIONE MISSIONIS,
LUSITANENSIS, A. D. 1767 NATI, QUI
ANNO 1783 INSTITUTUM INGRESSUS,
PRIMUS SUPERIOR DOMUS TUNGTANG
ET PRAESES IN TRIBUNALI ASTRONOMIAE
A. D. 1883 RENUNTIATUS, DIOECESIS
PEKINENSIS ADMINISTRATOR EUIT
AB ANNO 1808 AD ANNUM 1826,
QUO E VIVIS SUBLATUS EST,
AETATIS SUAE LIX.

碑文大意：李拱辰（Joseph Nunez Ribeiro）葡萄牙人，生于1767年，1783年入会真修。来华后任东堂第一主持。后内廷供奉，任钦天监监正。1883年（1）离开钦天监。1808年至1826年任北京教区视察员，达十八年之久。卒于1826年，年五十九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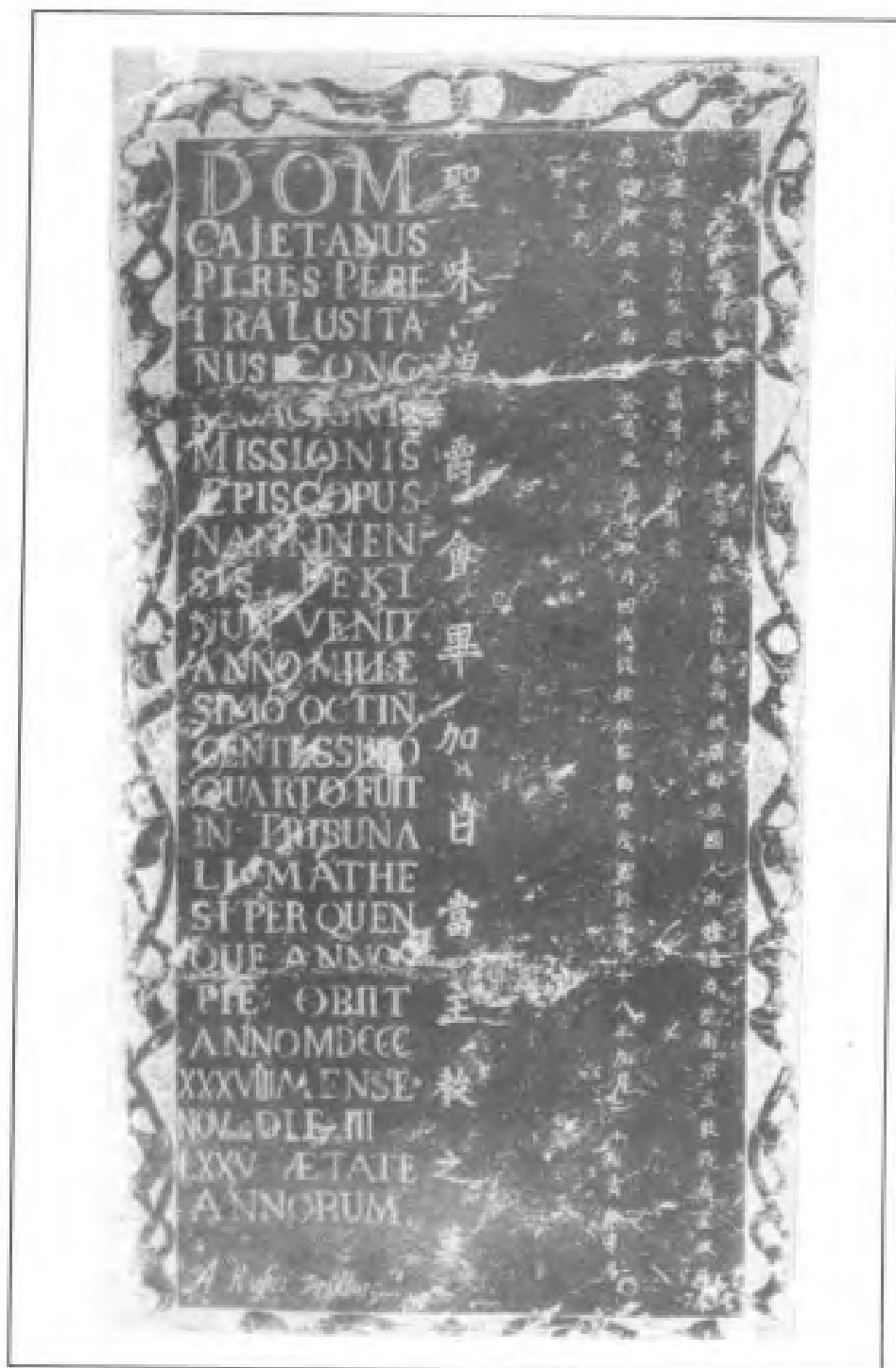
注释：

（1）1883年显然有误，疑为1803年。

编号: 16

碑文:

圣味增爵会毕加日当主教碑



圣味增爵会毕加日当主教之墓

圣味增爵会修士毕，字学源，讳教穷（1），系泰西玻尔都亚国（2）人。由韩德升南京主教（3）。于嘉庆玖年（4）奉旨进京效力，至道光貳年拾贰月（5）蒙恩升授钦天监右堂。于道光陆年玖月（6）因疾致仕，在监勤劳茂著。于道光十八年九月二十日（7）寿终，享年七十五岁。

注释：

（1）原名 Gaietanus Pires Pereira。在栅栏墓地现有资料中，这是最后一位在钦天监任职的外国传教士。

（2）葡萄牙。

（3）1800年来华，不久派往南京任主教。1827年又任北京教区负责人。

（4）1804年。

（5）1823年1月。

（6）1826年10月。

（7）1838年11月6日。

编号: 17

碑文:

圣味增爵会士张公之墓

圣味增爵会士张神父，圣名多默（1），北京人。生于乾隆五十三年（2），后升
铎德，即传教于近畿一带。至道光末年圣教多难之时，维持省方，教友大受其益。

后因劳成病，卒于咸丰元年（3），享年六十有三。

注释：

（1）外文名 Tchang Thomas。事迹不详。

（2）1788 年。

（3）1851 年。



编号：18

碑文：

圣味增爵会士蓝公之墓

圣味增爵会士蓝神父，名保禄（1），系丰润县小稻地人。距生于救世后一千八百三十三年，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入会，后于咸丰七年（2）升铎德品位，曾传教于宣化府、京东及西堂所属等处。兹于光绪九年（3）因病逝世于天津，享年五十有一。



注释：

（1）外文名 Paulus Lan。事迹不详。

（2）1857年。

（3）1883年。

编号：19

碑文：

圣味增爵会裴先生之墓

裴先生名亚伯尔多安当（1），系法国人，出生于千八百七十一年，于千八百八十九年入会，于九十一年（2）来中国，千八百九十三年（3）受五品神职，次年（4）即因病逝世，年二十有三。

注释：

（1）原名 Albrtus Antonius Periernatus。事迹不详。

（2）光绪十七年。

（3）光绪十九年。

（4）1894年。



编号：20

碑文：

圣味增爵会士文公之墓

圣味增爵会士神父，原名安多尼（1），系法国人。出生于救世后一千八百六



十二年，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入會，八十七年升釋德品位。光緒二十五年（2）來中國，先在修院教起性學，次年（3）奉匪作亂，北堂被圍時略受創傷，數日後復患瘵疾，因而安然謝世，享年三十有九，在會一十八年。

注释：

（1）原名 Antonius Chavanne Gallus。事迹不详。

（2）1899年。

（3）1900年。

来华西方传教士研究文献检索

文献名称	作者	写作年代	文献出处
中国教会大学史	(美国) 杰西著 曾钜生译		
利玛窦传	周一良		台湾禹贡五卷二期
基督教与中国教育	唐守谦		
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	(法国) 谢和耐著 于硕译		
从教外典籍所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 畴人传	陈垣 阮元	1799.	北平图书馆馆刊 8 卷 2 期
明清之际西算输入中国考略	张荫麟	1924. 6.	清华学报 1 卷 1 期
明末清初教士译著现存目录	陈垣	1924. 7.	青年会季刊 2 卷 2 期
基督教入华史略	陈垣	1924. 7.	真理周刊 18 期
明清之交西学东渐考	翁幕庄	1924. 8.	学灯
明清之际西算输入中国年表	李俨	1927. 12.	图书馆学季刊 2 卷 1 期
明清两代来华外人考略	张恩龙	1930.	图书馆学季刊 4 卷 3、4 期
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	向达	1930. 1.	东方杂志 27 卷 1 期
西统传入中国考	张维华	1930. 3.	齐大月刊 1 卷 6—8 期
明清以来西人东来之路径及其迳迹的次 第	李次民	1931	新东方周年纪念特刊 1931. 6.
明清两代来华外人考略 (续)	张恩龙	1931. 3.	图书馆学季刊 5 卷 1 期
徐阁老的旧宅——九间楼	徐宗泽	1932.	圣教杂志 21 卷 1 期
开教肇庆建堂三百五十周年奉教阁老去 世三百半周年	徐宗泽	1933. 1.	圣教杂志 22 卷 1 期
天主教流传中国史料		1933. 9.	文献丛编 16 卷 16、17 期
奉教阁老的传略	徐宗泽	1933. 11.	圣教杂志 22 卷 11 期
奉教阁老的民族	徐宗泽	1933. 11.	圣教杂志 22 卷 11 期
奉教阁老与科学	徐宗泽	1933. 11.	圣教杂志 22 卷 11 期
奉教阁老之政治经济	徐宗泽	1933. 11.	圣教杂志 22 卷 11 期

从徐氏庖言研究李我存杨淇园与徐文定公	徐景贤	1933. 11.	圣教杂志 22 卷 11 期
明代开教名贤之一李我存先生传略	陈援庵	1933. 11.	我存杂志 1 卷 12 期
奉教阁老的著作	徐景贤	1933. 11.	圣教杂志 22 卷 11 期
奉教阁老著作的存佚	徐宗泽	1933. 11.	圣教杂志 22 卷 11 期
中国学术史上大书特书徐问定与利玛窦之贡献		1933. 12.	北辰杂志 5 卷 19 期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		1934.	上海商务印馆
徐文定公和利玛窦的友情		1934.	圣教杂志 23 卷 2 期
第一个介绍西洋天文学以致整个科学到中国的徐光启	余青松	1934. 4.	国风半月刊 4 卷 1 期
利玛窦的前驱范礼安与罗明坚 (1) (2) (3)	鲁意	1934. 7.	北辰杂志 6 卷 10、11、12 期
西洋学术的输入之萌芽时期	金杭凤	1934. 9.	科学 18 卷 9 期
汤若望司铎年谱	渠志廉	1934. 9.	盘石杂志 2 卷 9 期
汤若望司铎年谱 (续)	渠志廉	1934. 10.	盘石杂志 2 卷 10 期
明代之西欧学术雇讲习会	鲁意	1934. 12.	北辰杂志 6 卷 19 期
基督教在华传教之功罪	姚宝猷	1935.	现代史学 2—4 期
基督教史纲	贾立言	1935.	上海广学会
马可索罗时代中国的基督教	明义士	1935.	齐大季刊 3—5 合期
利玛窦的政治思想	陈序经	1935. 1.	政治经济学报
利玛窦的政治思想	牛亦未	1935. 2.	新北辰 2 期
欧洲使节来华考	朱杰勤	1935. 11.	史学专刊 1 卷 1 期
明季清初西来天算对于清代学术的影响	唐肇黄	1936.	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 3 卷 2 期
天主教 16 世纪在华传教志		1936.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
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	洪煨莲	1936. 4.	禹贡半月刊 5 卷 3、4 期
中外关系 (1514—1834)	庄恭	1936. 9.	之江学报 1 卷 1 期
国民方豪传		1937.	杭州我存杂志社印行
明清之际西洋音乐传入中国记略	吴相湘	1937. 2.	大公报史地周刊 124 期
中国文化西渐之介绍者	徐宗泽	1938. 7.	圣教杂志 27 卷 7 期
十七、八世纪西欧之华化与中国之欧化	季思纯	1940. 3.	史学季刊 1 卷 1 期
汤若望汉名之来历	方豪	1941.	大公报文史周刊
明清之际西洋天文历算诸学传入中国之经过	张维华	1941. 4.	经世季刊 1 卷 4 期
明清间中西文化接触中之医学音学及对中国语文之贡献	张维华	1941. 8.	文史杂志 1 卷 10 期
明清间中西思想之冲突与影响	张维华	1942. 1.	学思 1 卷 1 期
明清间佛耶之争辩	张维华	1942. 1.	学思 1 卷 4 期

新航路的发现与欧人东来之追溯	郑师许	1942. 3.	现代史学 5 卷 1 期
明清两代来华外人考略	张恩龙	1942. 9.	东方文化(上海) 1 卷 4 期
十七八世纪来华西人对我国经籍之研究	方 豪	1943. 2.	思想与时代 19 期
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	方 豪	1944. 1.	文史杂志 3 卷 1、2 期
明末西洋火器流入我国之史料	方 豪	1944. 1.	东方杂志 40 卷 1 期
明季西洋学术思想之输入	郑鹤声	1944. 10.	文史杂志 4 卷 7、8 期
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学术西被之第二期	方 豪	1945. 1.	东方杂志 41 卷 1 期
明清之际传入我国的伽利略天文学说	严敦杰	1946.	天文爱好者 1964 年 2 期
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	范行准	1946. 6.	图书季刊新 7 卷 1、2 期
王徽与所译《奇器图说》	惠泽霖	1947. 1.	上智编译馆馆刊 2 卷 1 期
明万历原刊本《几何原本》(典籍之一)	淳 穆	1947. 3.	文物周刊 26 期
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明清间中国天主教人士译著简目	徐宗泽	1947. 3.	上智编译馆馆刊 2 卷 2 期
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所藏明清间教会书目	徐宗泽	1947. 7.	上智编译馆馆刊 2 卷 4、5 期
金尼阁西儒耳目资所记的音	陆志韦	1947. 12.	燕京学报 33 期
近代基督教传华的两种方式	孙善玲	1948. 1.	国际政治学院 1 期
王徽的“天学”与儒学	宋伯胤	1948. 6.	上智编译馆馆刊
利玛窦全集	方 豪	1951. 4.	新思潮 1 期
明清间西洋机械工程物理学与火器入华考略	方 豪	1953. 9.	学术季刊 2 卷 1 期
明清间耶稣会上译著提要正误	方 豪	1954. 3.	中华日报 1954. 3. 16.
中西文化交流	包遵彭	1956.	中国近代史论丛 1-2 期
利玛窦等人入华与徐光启等之科学活动	许剑冰	1957.	香港大学中文学会会刊
基督教与中国	林治平	1957.	台湾宇宙光出版社
谈《西儒耳目资》	杨道经	1957. 4.	中国语文 4 期
《读明清间耶稣会上译著提要》有感	化	1957. 6.	恒毅 11 期
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中叶我国出版的两本有关力学的书籍	王燮山	1958. 5.	物理通报 1958 年 5 期
明清间耶稣会上译著汉刊籍目略	梁子涵	1959. 10.	恒毅 9 卷 3 期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徐松石	1962.	浸信会出版部
中国的基督教	杨 程	1962. 1.	文社月刊 1—7 期
一部最早的罗马字拼音汉语词典——《西儒耳目资》原刻	鲁 深	1962. 5.	文汇报 1962. 5. 9.
徐光启和《几何原本》	毛子水	1962. 10.	中央日报 1962. 10. 1.
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	方 豪	1962. 11.	恒毅 12 卷 4 期
徐文定公与先贤汤若望神父	赵宾实	1962. 11.	恒毅 124 卷
李之藻传	陈 垣	1962. 12.	国学(上海大东) 1 卷 3 期

- | | | | |
|------------------------------|------|----------|----------------------|
| 明季修改历法始末（上）（中）（下） | 黎正甫 | 1963.11. | 大陆杂志 27 卷 10、11、12 期 |
| 明末荷兰宣教师编纂之番语文献 | 赖永祥 | 1964.12. | 台湾文献 15 卷 3 期 |
| 王微之事迹及其输入西洋学术之贡献 | 方 豪 | 1964.12. | 文史哲学报 13 期 |
| 天主教东传文献 | 吴相湘 | 1965. | 台湾学生书局 |
| 李之藻著述考 | 方 豪 | 1965.9. | 大陆杂志 31 卷 6 期 |
| 李之藻研究天主教之经过 | 方 豪 | 1965.9. | 恒毅 15 卷 2 期 |
| 李之藻挽救明朝危亡之努力——李之藻
诞生四百年纪念 | 方 豪 | 1965.10. | 新时代 5 卷 10 期 |
| 李之藻对于明季修历之贡献 | 方 豪 | 1965.10. | 现代学艺 2 卷 7 期 |
| 李之藻对于奉教之虔诚与对教会之贡献 | 方 豪 | 1965.10. | 恒毅 15 卷 3 期 |
| 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 | 吴相湘 | 1966. | 台湾学生书局 |
| 天主教与中国文化之探讨 | 李善修 | 1966. | 台湾 |
| 原始基督教所受中国古代文化之影响 | 张紫桐 | 1966. | 思想与时代 146 期 |
| 徐译几何原本影印本导言 | 毛子水 | 1966.9. | 书目季刊 1966.9.1. |
| 评王萍著《西方历算学之输入》 | 刘正言 | 1967.5. | 政治评论 18 卷 5 期 |
| 《西方历算学之输入》 | 黄修梧 | 1967.8. | 现代学苑 4 卷 8 期 |
| 中国基督教教史 | 杨森富 | 1968. | 台湾商务印书馆 |
| 明末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个未被重视的因
素 | 郝继隆 | 1968.12. | 东西文化 18 期 |
| 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化论丛 | 林治平 | 1970. | 台湾商务印书馆 |
|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汤若望传 | 陈 垣 | 1970. | 香港公教真理会 |
| 中国基督教史纲 | 王治心 | 1971. | 文海出版社（台北） |
| 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 | 吴相湘 | 1972. | 台湾学生书局 |
| 基督教在华早期传播史 | 陈健夫 | 1972. | 浸信会出版部 |
| 明清之际西人东来与中西文化的交流 | 杨予六 | 1972.6. | 国立编译馆馆刊 1 卷 3 期 |
| 明末各省天主堂所在地名表手抄稿两种 | 方 豪 | 1974.11. | 大陆杂志 49 卷 5 期 |
| 徐光启和崇洋媚外思想 | 数学系 | 1975.2. |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2 期 |
| 明末传入的西洋教育 | 方 豪 | 1975.5. | 东方杂志（复刊）1975.5. |
| 徐光启与李善兰——几何原本的翻译 | 陈胜昆 | 1975.7. | 科学月刊 6 卷 7 期 |
| 基督教入华百七十年纪念集 | 林治平 | 1977. | 台湾宇宙光出版社 |
| 一百七十年来的基督教 | 查 时 | 1977. | 台湾宇宙光出版社 |
| 徐光启——介绍西洋科学的第一人 | 上海灯厂 | 1977.3. | 自由青年 |
| 基督教与中国历史图片论文集 | 林治平 | 1979. | 台湾宇宙光出版社 |
| 利玛窦耶稣会士在华学术活动 | 冯天瑜 | 1979.4. | 汇江论坛 4 期 |
| 旧中国的教会大学 | 滕玉屏 | 1980.2. |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 |
|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 顾长声 | 1981.4.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 东正教传入中国及其在北京、天津的发
展 | 高 崖 | 1981.4 | 求是学刊 4 期 |

利玛窦中国札记		1983.	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利玛窦在中国的活动与影响	林金水	1983. 1.	历史研究 1 期
上海天主教传教史略	周立	1983. 4.	宗教学研究 4 期
鸦片战争期间天主教传教士的在华活动	徐恭生	1983. 7.	历史教学 7 期
法国的宗教侵略活动与中法战争	何桂春	1984. 3.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3 期
十六世纪耶稣会士在华传教政策的演变	孙西合	1985. 1.	文史哲 1 期
利玛窦与中国	李甲	1985. 3.	世界历史 3 期
试析天主教和新教清末在华活动的区别	刘世龙	1985. 4.	社会科学研究 4 期
雍正驱逐传教士与清前期中西交往的中 落	陈东林	1985. 5.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5 期
西方传教士与晚清的格致学	胡思庸	1985. 6.	近代历史研究 6 期
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	顾长声	1985. 8.	上海人民出版社
康熙帝与西洋传教士	李振田	1986. 1.	历史档案 1 期
十六世纪天主教对华传教政策的演变	刘建	1986. 1.	世界宗教研究 1 期
英美传教士对戊戌维新运动的推动及前 后态度的变化	何桂春	1986. 3.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3 期
论传教士在近代自然科学传播中的主导 作用	陈静	1986. 3.	兰州大学学报 3 期
西方传教士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影响	张子荣	1986. 3.	晋阳学刊 3 期
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对中西文化交流 的贡献	徐明德	1986. 4.	杭州大学学报 4 期
基督教在华高等教育初探	徐以骅	1986. 5.	复旦学报 5 期
郎士宁在中国	顾卫民	1987. 1.	上海教育学院学报 1 期
丁韪良在宁波十年宗教活动述评	王维俭	1987. 3.	浙江学刊 3 期
再谈早期的教会学校——为教会教育服 务之团体	李楚材	1987. 3.	档案与历史 3 期
简论徐光启的宗教思想	刘建	1987. 4.	世界宗教研究 4 期
太平天国上帝教——基督教的东方教派	邹明德	1987. 11.	学术月刊 11 期
试论中国基督教本色教会运动的起因	王继武	1988. 1.	世界宗教研究 1 期
试论我国 1922——1927 年间的非基督教 运动	夏瑰琦	1988. 2.	杭州大学 2 期
早期恽代英与基督教	韩凌轩	1988. 2.	近代史研究 2 期
晚清知识分子非基督教倾向的文化原因	陶飞亚	1988. 3.	世界宗教研究 3 期
“五四”运动中天津天主教徒与基督教 徒的救国活动	李运华	1988. 4.	天津社会科学 4 期
利玛窦为何能在中国站住脚跟	易开运	1988. 12.	历史教学 12 期
论明清间西方传教士对中西哲学之比较		1989. 1.	世界宗教研究 1 期
非基督教运动述评	刘心勇	1989. 2.	复旦学报 2 期

- 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的专业化
略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国内学术界近年来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
问题研究综述
中国近代教案斗争的矛盾探析
道咸经世派基督教观述评
试论反洋教的历史合理性及其后果
天主教的输入与晚明士人的价值认同
试论中国耶稣会传教重心的转移
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
试论南怀仁对康熙天主教政策的影响
唐以前基督教来华史料
圣经译本在中国
十九世纪中国社会排拒基督教的原因
试论顺康雍三朝对西方传教士政策的演
变
近代美国基督教在华传教述略
近十年来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综述
明代至近代天主教和新教在华活动比较
研究
从沙勿略到庞迪我：晚明西班牙来华传
教士
浅议利玛窦“合儒”
四十年来我国基督教教徒活动框架的变
迁
希伯来·基督教经典汉译史略
元代泉州天主教遗迹和遗物
基督教的传入与西学东渐
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流的实例：评《龙与
十字架》
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社会生活
的西传
明清之际：中国文化近代化进程的起点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的天主教儒学化
十六至十八世纪天主教在中日两国传播
和禁绝的比较研究
基督教与十九世纪中国的社会变迁
19—20 世纪中国的汤若望介绍与研究
- 史静寰 1989. 6. 历史研究 6 期
宋剑华 1989. 10. 理论学习月刊 10 期
孟曙初 1990. 2. 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
金松林 1990. 2. 浙江财经学院学报 2 期
王 栋 1990. 2. 北方论丛 2 期
于民雄 1990. 4. 贵州社会科学 4 期
邓建华 1990. 5. 湖北大学学报 5 期
钱志坤 1990. 5.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5 期
于 可 1991. 1. 历史教学 1 期
林金水 1991. 1. 黑龙江民族丛刊
丁建岭 1991. 1. 金陵神学志 1 期
王维藩 1991. 1. 金陵神学志 1 期
顾卫民 1991. 2. 江海学刊 2 期
冯佑哲 1991. 3. 世界宗教研究 3 期
王立新 1991. 4. 世界教学 4 期
阿桂春 1991. 4. 世界宗教研究 4 期
何桂春 1991. 4. 福建师范学院学报 4 期
张 铠 1991. 4. 世界宗教研究 4 期
陈雪花 1991. 4. 浙江学刊 4 期
萧志恬 1991. 5. 社会科学报 23 日
朱维之 1991. 5. 历史教学 5 期
杨钦章 1991. 5. 中国天主教 5 期
胡宪之 1991. 6. 史学月刊 6 期
冯祖贻 1991. 6. 近代史研究 6 期
许 敏 1992. 1. 史学集刊 1 期
陈寒鸣 1992. 1. 河北学刊 1 期
卫 平 1992. 2. 文史哲（济南）1992. 2. 3.
田毅鹏 1992. 2. 历史教学 2 期
庄维民 1992. 4. 世界宗教研究 4 期
顾卫民 1992. 4. 社会科学（上海）4 期

后 记

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中国人地的改革开放大潮，以强劲的阵势推动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促进了当代中西文化的交流。形势令人激越振奋。面对前所未有的盛景，人们不由得会想起曾经为此种文化交流事业自觉不自觉地做出过贡献而今已经作古的前人。滕公栅栏传教士墓地就静卧着一批这样的前人。这里是物化了的历史，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尽管它的意义远不能与今天的深厚蕴含相提并论，但毕竟于今人有着借鉴和启迪的教益。抛却其暗影，品味其经验教训，当能发挥以史为镜的作用。正因此，我们编写了这本《历史遗迹》。

参加编写工作的有高智瑜（本书第一部分：一段不应忘却的历史）、余三乐（本书第二部分：几度沧桑话“栅栏”）、林华（本书第三部分：栅栏墓地碑文录和第四部分：栅栏墓地碑文资料录）、钟志勇（本书第五部分：来华西方传教士研究文献检索）。书中示意图、照片和图片由林华、钟志勇、沈昌瑞拍摄或提供。高智瑜作为本书的策划，拟定了全书框架、思路，并作了最后修改审定。

本书编著过程中，郑晓叶女士提供了大量书目。马文华女士、金培华先生作了资料翻译工作。高毅民、张敬亭、郝观山、徐万洋等先生也给予我们很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北京行政学院领导自始至终关心并支持本书的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领导和陈德义副编审为出版本书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此，我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本书仅属研究的初期成果，编著者还在进一步学习和研究中。疏漏和不足之处，敬请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93-6